

公共管理学科·社会保障系列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郑春荣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 郑春荣编著. -- 上海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5. 7. -- (公共管理学科 · 社会保障系列). -- ISBN 978-7-5642-4695-2

I . D5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BV6351 号

责任编辑: 江 玉

书籍设计: 张克瑶

投稿邮箱: jiangyu@msg.sufe.edu.cn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著 作 者: 郑春荣 编著

出版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新文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插页:2)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2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老龄化趋势及其影响	/ 1
第一节 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	/ 1
第二节 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 6
第三节 老龄化与老年人口赡养率的变化趋势	/ 13
第四节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 18
拓展阅读:人口赡养比、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	/ 28
复习思考题	/ 29
第二章 家庭的小型化与社会保障	/ 31
第一节 各国的家庭组成情况及发展趋势	/ 31
第二节 家庭成员的数量及变化趋势	/ 41
第三节 关于家庭政策的几种观点	/ 44
第四节 社会保障给付单位的选择	/ 48
拓展阅读:世博大礼包发放中关于“家庭”认定的困惑	/ 52
复习思考题	/ 53
第三章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	/ 55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 56
第二节 全球化对各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	/ 65
第三节 社会保障政策的跨国协调	/ 71
拓展阅读: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办法	/ 78
复习思考题	/ 79
第四章 后工业化与社会保障	/ 81
第一节 技术革新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	/ 81

第二节 零工经济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 / 88

第三节 劳务派遣制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 / 91

拓展阅读:美国加州法案规定网约车司机不属于企业雇员 / 96

复习思考题 / 98

第五章 各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分类 / 100

第一节 蒂特马斯的福利国家三种模式 / 100

第二节 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 / 102

第三节 选择性社会福利与普惠性社会福利 / 107

第四节 福利体制的“三个世界” / 110

拓展阅读:医疗保障的五种模式 / 117

复习思考题 / 119

第六章 各国社会保障概况 / 121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定义与构成 / 121

第二节 各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量 / 124

第三节 各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 128

第四节 新的社会福利核算方法及其内涵 / 132

拓展阅读:资源诅咒与“荷兰病” / 137

复习思考题 / 139

第七章 各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 / 141

第一节 分裂的福利政策理念 / 141

第二节 持续削减的社会保障支出 / 146

第三节 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与就业形势 / 149

第四节 锐减的就业人群工作时间 / 161

第五节 部分国家相对滞后的养老保障改革 / 164

第六节 有限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空间 / 168

拓展阅读:美国乐龄会 / 170

复习思考题 / 170

第八章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 / 172

第一节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经济与财政 / 172

第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税收特点	/ 179
第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	/ 183
第四节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的环境条件	/ 194
第五节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面临的挑战	/ 200
拓展阅读:丹麦的就业培训政策	/ 203
复习思考题	/ 204

第九章 法团主义福利模式 / 205

第一节 法团主义福利国家的经济与财政	/ 205
第二节 法团主义福利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	/ 216
第三节 法团主义福利模式的环境条件	/ 221
第四节 法团主义福利模式的挑战与改革	/ 227
拓展阅读:德国社会救助业务外包的负面效应	/ 237
复习思考题	/ 238

第十章 自由主义福利模式 / 240

第一节 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经济与财政	/ 240
第二节 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	/ 246
第三节 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环境条件	/ 253
第四节 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之间的福利模式差异	/ 257
拓展阅读:美国的配偶养老金制度	/ 262
复习思考题	/ 264

第十一章 南欧福利模式 / 266

第一节 南欧国家的经济与财政	/ 266
第二节 南欧福利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	/ 272
第三节 南欧福利模式的环境条件	/ 282
拓展阅读:南欧的年轻人如何熬过漫长的失业期	/ 287
复习思考题	/ 288

第十二章 拉美国家福利模式 / 290

第一节 拉美国家的经济与财政	/ 290
第二节 拉美国家的增长性贫困现象	/ 301

第三节 拉美福利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 / 305

第四节 拉美福利模式的环境条件 / 316

拓展阅读: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 / 325

复习思考题 / 327

后记 / 330

第一章 世界老龄化趋势及其影响

在介绍社会保障政策之前,需要了解各国的老龄化趋势,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条件。与老龄化趋势相对应,养老保障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当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后,将度过漫长的退休时光,需要一个有保障的收入来源来安度晚年,因此,各国政府建立的养老保障制度日趋重要。近年来,受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优化。

本章主要介绍预期寿命、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预期寿命提高,生育率降低都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本章最后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节 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标。近 200 年来,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持续且快速地增长。以英国为例,19 世纪 40 年代出生的人预期寿命不到 40 岁。1900 年,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为 45~50 岁^①,人类的晚年生活较为短暂,而且子孙众多,养老保障不成问题。

随着营养、个人和公共卫生、医疗、居住条件的改善,到了 21 世纪,人类寿命更提升至一个新台阶。然而,战争和疫情仍不时打断预期寿命的增长。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通过粮食绝收、自然灾害等多种方式,导致营养不良、疟疾、痢疾和热应激等问题,增加死亡风险。经济发展也带来一些不利于寿命提升的因素,如环境污染导致癌症死亡人数增加,肥胖相关疾病增多。1990—2022 年,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率增加了四倍多,成年人

^①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ge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Celebration and A Challenge*, 2012.

肥胖率增加了一倍多,全球每八人中就有一人患有肥胖症。^①

总体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医学进步,尤其是中风和心脏病的救治,大幅提高了人类预期寿命。全球人口平均寿命从 1990 年的 64.2 岁增至 2021 年的 71 岁,预计 2050 年将达到 77.2 岁(见表 1.1)。然而,近年来预期寿命增长放缓,原因之一是过去十几年医疗保健领域缺乏重大突破,二是虽然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但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表 1.1 全球各地区的预期寿命情况 单位:岁

地区	2021 年			2050 年		
	男性	女性	全部	男性	女性	全部
全球平均	68.4	73.8	71.0	74.8	79.8	77.2
撒哈拉以南非洲	57.8	61.6	59.7	64.3	69.1	66.7
北非和西亚	69.7	74.8	72.1	76.0	80.8	78.3
中亚和南亚	65.9	69.6	67.7	74.9	79.4	77.1
东亚和东南亚	73.6	79.6	76.5	79.4	84.1	81.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8.8	75.8	72.2	78.1	83.1	80.6
澳大利亚、新西兰	82.7	85.6	84.2	85.4	88.6	87.0
大洋洲	64.6	70.1	67.1	68.4	74.9	71.6
欧洲和北美	73.9	80.4	77.2	81.6	86.1	83.8

注:大洋洲的数据不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2022.

一、各国的预期寿命情况

从区域来说(见表 1.1),2021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平均预期寿命最长,为 84.2 岁;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地区,为 77.2 岁;然后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76.5 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2.2 岁)、北非和西亚地区(72.1 岁)、中亚和南亚地区(67.7 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低,仅为 59.7 岁,比欧美低了 17.5 岁。

长寿的增加可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善、工作条件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保健的进步。日本的预期寿命长期位居全球前列,这主要得益于均衡

^① Phelps N H, Singleton R K, Zhou B, et al. Worldwide trends in underweight and obesity from 1990 to 2022: A pooled analysis of 3663 population-representative studies with 222 milli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The Lancet*, 2024, 403(10431), 1027—1050.

的饮食、良好的卫生习惯、定期体检的普及,以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该国在慢性病初级和二级预防方面的努力。此外,通过全民医保制度,日本加速了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从而显著改善了人口健康状况。在美国,西班牙裔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其平均预期寿命远高于白人。2017 年,美国西班牙裔、白人和黑人的预期寿命分别为 81.8 岁、78.8 岁和 75.3 岁。这一现象可能归因于西班牙裔人群较低的吸烟率、较高的母乳喂养率、紧密的家庭和社区联系,以及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西班牙裔的预期寿命相对较高。

在过去几年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①中的许多成员国报告了预期寿命的小幅下降。以美国为例,如图 1.1 所示,美国的预期寿命在 2014 年达到历史最高值(78.9 岁)后,在 2015—2018 年间小幅下降,在 2019 年又回升至 78.9 岁,但此后再次下降。造成这种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的原因似乎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冲击。此外,从 1999 年到 2017 年,美国工作年龄段(25 岁至 64 岁)人群与服药过量、高血压疾病、肥胖、酗酒、自杀相关的死亡率分别增加 386.5%、78.9%、114%、40.6%和 38.3%。2016 年,药物过量导致超过 63 000 名美国人死亡,其中 2/3 的死亡由阿片类药物引起,包括芬太尼(Fentanyl)和曲马多(Tramadol)等强效合成药物。这些药物更容易因意外而过量使用,且在非法吸毒者中越来越流行。另外,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预期寿命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冬季老年人死亡率显著增加(主要受冬季流感的影响),以及心脏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缓慢。^②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世界各地的平均预期寿命长期保持一种大体均衡的状态。例如,在 1900 年,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平均寿命分别是 47 岁、45 岁和 43 岁。作为农业国的日本,其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 1/4,但其平均寿命仅略低于英美,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工业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污染导致的死亡较少。而在英美国家,城市化进程较快,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和公共卫生设施不完善,许多传染病都可能导致死亡,加上城市空气和水资源污染严重,因此,在当时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人们难以保持健康和长寿。^③

① OECD 成员国多为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也包括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等新经济增长体。2021 年 OECD 成员国人口总量达 13.8 亿,GDP 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为 46%。OECD 成员国的政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各国改革的指向标,因此,OECD 又被称为“最佳实践的集中地”。该组织于 1961 年成立时,有 20 个创始成员国,一度被称为“富国俱乐部”。此后不断扩容,有越来越多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加入。目前 OECD 成员国数量已增至 38 个。OECD 成员国代表性较强,社会保障制度成熟,且数据较为全面,口径统一,本书主要引用 OECD 成员国的数据。

② Public Health England. A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in Mortality in England.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cent-trends-in-mortality-in-england-review-and-data-packs, 2018.

③ (日)吉川洋:《人口与日本经济》,殷国梁、陈伊人、王贝贝译,九州出版社 2020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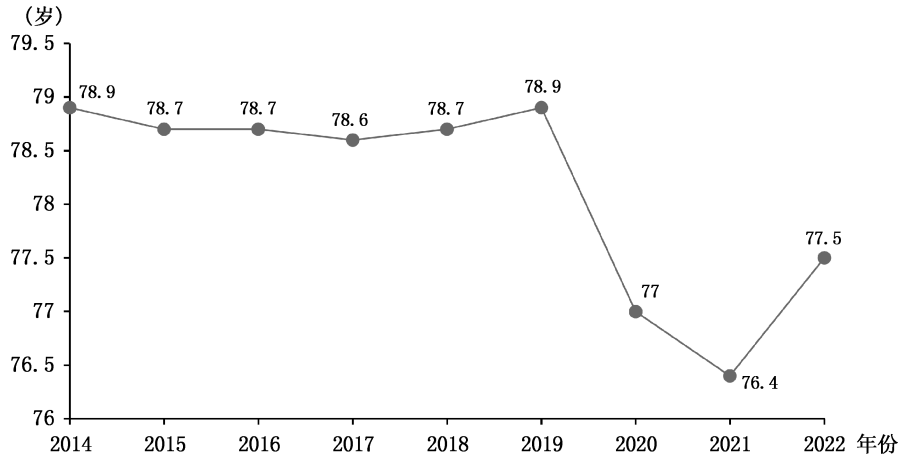


图 1.1 2014—2022 年美国的预期寿命情况

资料来源:Kochanek K D,Murphy S L,Xu J,et al.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22.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然而,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呈现快慢不一的差异,富国寿长、穷国命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寿命的“两极”差距逐渐拉大。2019 年,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地区)是中国香港、日本和澳大利亚,均超过了 84 岁;而预期寿命最短的国家是中非共和国、莱索托、尼日利亚和乍得等,预期寿命不到 54 岁(见表 1.2)。46 个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的人口预期寿命只有 64.1 岁,比全球平均值低 5.9 岁,主要原因在于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较高,以及暴力、冲突、艾滋病扩散等因素的影响。

表 1.2 2021 年世界上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地区)与最低的国家(地区) 单位:岁

国家(地区)	预期寿命	国家(地区)	预期寿命
中国香港	85.5	南苏丹	55.0
日本	84.8	中非共和国	53.9
澳大利亚	84.5	莱索托	53.1
瑞士	84.0	尼日利亚	52.7
马耳他	83.8	乍得	52.5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1*,2021.

需要指出的是,预期寿命高低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相关,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平等程度。一般而言,极贫困人口会有极其短暂的寿命,而一旦超过贫

困线,增加的收入对寿命长短的影响甚微。有一些发达国家虽然人均收入较高,但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贫困人群的预期寿命较短,因而拉低了整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威尔金森和皮科特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收入更均衡的国家,人们的预期寿命更长。^① 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预期寿命比最贫困的1%人口的预期寿命多10~15岁,而且自21世纪初以来,这个差距一直在拉大。^② 在2018年发表于《世界精神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回顾了全球26项关于收入不平等研究。^③ 他们发现,2/3的研究指出,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患抑郁症的人数也在增加。研究人员对其中12项研究重新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与生活在收入较平等社会中的人相比,生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社会中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约是前者的1.2倍。研究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也较高,或许是因为这种不平等削弱了社会凝聚力,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多长期压力。

二、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因性别而异。2016年,OECD成员国中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3.3岁,而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7.9岁,两者平均差距达到5.4岁。男女死亡原因的差异,部分源于生物学因素,部分受环境和社会因素影响,还有一些与卫生服务的提供和获取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卫生统计》(*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9*)显示,如果妇女能够获得卫生服务,产妇死亡人数就会减少,预期寿命将会延长。在许多情况下,男性比女性更少求医问药;同时,男性更有可能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的非传染性疾病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在女性难以获得卫生服务的地区,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最小。在卫生服务稀缺的低收入国家,每41名妇女中就有1人死于怀孕和分娩;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每3300名妇女中有1人死亡。在9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每1000人中只有不到4名护理人员和助产士。

在导致死亡的40个主要原因中,有33个会导致男性预期寿命低于女性。例如,2016年,一名30岁男性在70岁之前死于心脏病、肺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概率比女性高44%,主要原因是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运动;男性自杀死亡率比女性高75%;15岁以上男性人口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约为女性的两倍;男性因

① (英)理查德·威尔金森、(英)凯特·皮科特:《公平之怒》,李岩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② Chetty R, Stepner M, Abraham S,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 *Jama*, 2016, 315(16), 1750–1766.

③ Patel V, Burns J K, Dhingra M, et 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 scoping review of mechanisms. *World Psychiatry*, 2018, 17(1).

凶杀案导致的死亡率也是女性的数倍。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个区别:预期寿命与老龄化负担并不完全等同。预期寿命是指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是造成预期寿命增加的重要原因。老龄化负担则主要是指那些存活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因领取养老金以及享受医疗护理而给社保基金带来的压力。简而言之,退休后余命的增加会导致社保基金负担加重,而退休前参保人的死亡率与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节 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人口出生数量取决于生育适龄期的女性人口数量、生育率,而生育适龄期的女性人口数量又取决于上一个人口周期的人口出生数量。因此,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出生数量也会出现波动;同样地,在生育适龄期女性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鼓励生育,也可促进人口出生数量的增加。

有时存在“进度效应”(tempo effect),生育率下降是暂时的。^①例如,由于经济危机,生育适龄期的女性延迟了生育,等经济回暖和工作稳定之后再生育。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国“婴儿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国家,以美国最为典型,形成了为期近 20 年的生育高峰,被称为“婴儿潮”(baby boom)。战后,大量退伍士兵返回国内,同时又有大量年轻女性在战争时期赋闲在家,单身男女的数量因战争拖延而变得庞大,他们结婚成家 and 养儿育女的愿望非常迫切。1946—1964 年,美国全国共有 7 590 多万名婴儿出生,约占 1964 年总人口的 40%。

欧洲主要参战国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逐步走向振兴,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这在客观上为年轻一代组建家庭创造了有利条件:结婚成本较低,且家庭拥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教育机制的革新也为生育子女提供了稳定的保障。此外,年轻一代对战后新生活的美好期望也进一步推动了生育意愿。因此,这一时期的生育率非常高。

在亚洲,从 1947 年至 1949 年,日本迎来了和平时空前的婴儿出生高峰,三年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超过 800 万。这一数字在日本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这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而对韩国而言,朝鲜战争结束后的 10 年是生育高峰期。

除了人口自然繁衍的迅速增长外,战后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成了“婴儿潮”的“助产

^① 吴帆:《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1 期。

士”。战后重建需要大量人力,政府也鼓励家庭多生育。例如,苏联政府长期鼓励生育,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英雄母亲”是苏联政府为生育 10 个以上子女(且最小的孩子应不小于 1 岁)的妇女设立的荣誉称号。1944—1980 年,共有 32.4 万名苏联妇女获此殊荣。

“婴儿潮”世代的成长、就业与消费等对经济周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个人根据一生的预期收入分配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通过不同的投资储蓄比平滑消费,以实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最大化。劳动年龄人群具有收入来源,在收入较高时会增加储蓄,购入资产,导致国家的资产价格升高,实际利率水平下降,还可能产生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而非劳动年龄人群(老年人)没有收入来源或收入很少,储蓄率相应降低,会出售资产以满足消费需求,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二、各国的总和生育率趋势

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婴儿潮”持续了 20 年左右,大约从 1970 年开始,生育率急剧下降。背后的原因很多,例如:经济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育儿成本提高;贫富差距增加,一些居民居住环境较差;避孕工具被推广并普及;各国人工流产合法化;妇女教育程度提高,独立意识增强,劳动参与率提高;疫苗接种普及,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社会福利保障提升,加速了养儿防老意识的淡化。

OECD 成员国的生育率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开始持续下降,在 2000—2008 年间,平均生育率有所回升,但 2009 年,许多 OECD 成员国的生育率回升停止了,这可能是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OECD 成员国的生育率从 1970 年的每个育龄妇女平均 2.8 个孩子下降到 2020 年的 1.66 个孩子。

在总体下降的同时,OECD 成员国的生育率有趋同趋势。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分别从 1970 年的 6 个、4.53 个和 5 个下降至 2016 年的 2.18 个、1.17 个和 2.11 个,即平均每名妇女少生了 3 个孩子。

2020 年,OECD 成员中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远低于自然替代率(natural replacement rate,即每名妇女生育 2.1 个孩子),OECD 成员国的生育率平均水平为 1.66(见表 1.3)。其中,只有两个国家的生育率高于自然替代率,分别是以色列(3.04)、墨西哥(2.14)。土耳其(2.08)位列第三,勉强接近自然替代率。瑞典(1.85)、法国(1.85)和爱尔兰(1.84)的生育率在欧洲排名前三位。总体上看,英语国家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通常处于较高的水平,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是南欧、日本和韩国。近年来南欧经济较为低迷,加上长期以来不重视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生育率下降很快。

表 1.3 OECD 成员国的总和生育率

国家	1960 年	1980 年	2000 年	2020 年	2040 年	国家	1960 年	1980 年	2000 年	2020 年	2040 年
澳大利亚	3.41	1.99	1.79	1.83	1.73	立陶宛	2.66	2.10	1.47	1.67	1.75
奥地利	2.57	1.65	1.39	1.53	1.65	卢森堡	2.23	1.49	1.72	1.45	1.52
比利时	2.50	1.70	1.60	1.71	1.75	墨西哥	6.78	5.33	2.85	2.14	1.80
加拿大	3.88	1.73	1.56	1.53	1.52	韩国	6.33	2.92	1.50	1.11	1.25
智利	4.75	2.94	2.20	1.65	1.57	拉脱维亚	1.95	1.89	1.17	1.72	1.78
捷克	2.38	2.36	1.17	1.64	1.75	荷兰	3.10	1.60	1.60	1.66	1.72
丹麦	2.55	1.68	1.76	1.76	1.79	新西兰	4.07	2.18	1.95	1.90	1.77
爱沙尼亚	1.99	2.06	1.33	1.59	1.71	挪威	2.84	1.81	1.86	1.68	1.73
芬兰	2.77	1.66	1.74	1.53	1.53	波兰	3.47	2.23	1.51	1.42	1.57
法国	2.70	1.86	1.76	1.85	1.84	葡萄牙	3.12	2.55	1.46	1.29	1.49
德国	2.27	1.51	1.35	1.59	1.67	斯洛伐克	3.24	2.46	1.40	1.50	1.65
希腊	2.42	2.42	1.31	1.30	1.37	斯洛文尼亚	2.38	2.16	1.25	1.60	1.71
匈牙利	2.32	2.25	1.38	1.49	1.63	西班牙	2.70	2.55	1.19	1.33	1.51
冰岛	4.17	2.45	2.06	1.77	1.67	瑞典	2.25	1.66	1.56	1.85	1.84
爱尔兰	3.58	3.25	1.90	1.84	1.70	瑞士	2.39	1.54	1.48	1.54	1.61
以色列	3.89	3.47	2.93	3.04	2.63	土耳其	6.50	4.69	2.65	2.08	1.82
意大利	2.29	1.89	1.22	1.33	1.42	英国	2.49	1.73	1.74	1.75	1.77
日本	2.17	1.83	1.37	1.37	1.49	美国	3.58	1.77	2.00	1.78	1.80
						OECD 平均	3.19	2.26	1.67	1.66	1.68

注：阴影部分的数据表示总和生育率高于自然替代率(2.1)。

资料来源：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9*;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预计到 2040 年,OECD 成员国的平均生育率将缓慢回升到 1.68,略高于 2020 年的水平。^① 各国的生育率将继续呈现趋同趋势,许多目前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出现回升趋势,而生育率较高的几个国家均面临下滑态势,只剩下以色列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高于自然替代率。

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高于 OECD 成员国,但也同样面临生育率下滑的趋势(见表 1.4)。例如印度,其生育率快速下降,从 1960 年的 5.90 降至 1970 年的 5.49,到 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又降低至 3.48 和 2.63,2020 年则只有 2.24。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在几个发展中大国中是最低的。俄罗斯的低生育率已持续了较

^① 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9*; *OECD Social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长时期。展望 2040 年,除中国的生育率略有回升以外,其他 7 个国家均继续下降。

表 1.4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国家	1960 年	1980 年	2000 年	2020 年	2040 年	国家	1960 年	1980 年	2000 年	2020 年	2040 年
阿根廷	3.13	3.40	2.63	2.27	2.02	印度尼西亚	5.67	4.73	2.55	2.32	2.00
巴西	6.06	4.24	2.47	1.74	1.56	俄罗斯	2.82	1.94	1.25	1.82	1.83
中国	5.48	3.01	1.62	1.69	1.73	沙特阿拉伯	7.18	7.28	4.40	2.34	1.83
印度	5.90	4.97	3.48	2.24	1.92	南非	6.05	5.05	2.88	2.41	2.07

注:阴影部分的数据表示总和生育率高于自然替代率(2.1)。

资料来源: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9: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专栏 1.1 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 岁)平均每人生育的子女数。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1.5,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出生 1.5 个小孩。

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 2.1,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2.1 个孩子时,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这是因为在用总和生育率衡量时,需要考虑到一代人所生孩子成长为做父母之前将有部分死亡的可能性,例如由于车祸或疾病而死亡。而这种可能性又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在死亡率较高的时代,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也较高。

有学者认为,生育率与妇女直接有关,所谓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是在假定一个国家的男女比例是 1:1 这种理想的情况下才成立的。然而,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男多女少,根据《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出生婴儿性别比居高不下。1996—2005 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 12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要在 2.3 左右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三、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一般而言,生育率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富裕程度

富裕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富裕程度主要通过城市化水平及妇女受教育水平来影响生育率。一般而言,农村的养儿防老观念较强,而且农村社会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生育率往往较高。在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市并全面融入城市后,生

活水平上升,生活成本增加,经济压力也变得更大。在这种经济压力下,降低生育率成为控制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一种选择。这样,“城市化”通过社会经济的杠杆将抑制作用传导给“人口生育率”。与此同时,富裕程度越高,一般妇女受教育水平就越高,从而导致生育率较低。此外,富裕程度还可能通过影响避孕工具获得的难易程度来影响生育率,以及通过影响流产因素来影响生育率。

(二) 社会观念和宗教因素

社会观念、宗教因素会影响生育行为。例如,中国传统社会有生儿子才能传宗接代的说法,同时,是否有生育儿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母亲的家庭地位,因此,女性生育儿子的动力很大,间接提高了生育率。很多宗教都反对堕胎。宗教因素主要通过社会观念、妇女地位等来影响生育率。例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生育率远高于其他地区,这显示了宗教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三) 国家的育儿福利政策

传统上认为,女性就业率提高,会降低生育率。然而,各国实践表明,运作良好的福利政策与育儿服务(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让女性以育儿假的形式安心地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可以抵消就业率提高带来的负面效应,高就业率与高生育率并存是完全可能的。^①

(四) 预期的相对收入

预期的相对收入减少会限制生育。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生育率受消费欲望(aspirations)和预期收入的影响,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总是处于增长之中,预期收入则因人口老龄化等原因而减少,会影响生育行为。^② 此外,近年来,各国青年的就业环境有一定的恶化趋势,主要体现为非正式雇佣现象增多以及薪酬降低。经济困难,缺乏经济安全感,限制了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愿望。如果丈夫是非正式员工而收入较低的话,他就不得不同时兼两份、三份的工。当丈夫需要长时间工作时,家里必然就看不到“父亲”的身影。如此看来,即便拥有丈夫或伴侣,女性实际上仍是置身于母子家庭中,独自担负“孤独育儿”的任务,因而女性往往不愿生育。^③

(五) 生育年龄

在有相关数据的 OECD 成员国中,有 30 个国家的妇女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在逐年增加。1995—2016 年,OECD 成员国的妇女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增加了近 3 岁——

^① OECD. *Starting Strong 2017: Key OECD Indicator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7.

^② Easterlin R A. Relative income status and the American fertility swing//Sheldon E B. *Family Economic Behavior: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73.

^③ (日)小林美希:《不让生育的社会》,廖雯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版。

从 26 岁增加到 28.9 岁。

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延迟意味着育龄期的缩短,从而导致生育数降低。2016 年,美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妇女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最低,约为 27 岁,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而日本、韩国、爱尔兰、卢森堡、瑞士、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妇女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则超过 30 岁。

导致育龄延迟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女性进入职场,造成家庭组成的时间延迟,也使得生育时间递延。第二,女性受教育年限延长。女性就业机会与其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容易被聘用。女性受教育的比例大幅提高,较以往有更多机会进入职场,加上男性与女性在职场上皆致力于确立自身的地位与角色,使得女性生育年龄延迟,且生育数量也显著减少,甚而形成许多无子女家庭或单身家庭。

从医学上看,女性最适宜怀孕的时期是 20~29 岁。随着年龄增加,怀孕难度增大,流产率也会增高。与 20~30 岁相比,35 岁时的受孕概率将下降 1/2。通常医学上将 35 岁以上的初产妇定义为高龄产妇。对高龄产妇而言,成为高危孕妇的可能性非常高,一旦罹患妊娠高血压,便伴随着死亡的危险。

生育年龄延迟还可能降低储蓄率。^① 例如,对于 30 岁以前生育的夫妇而言,到了 50 岁左右,子女已长大成人,夫妇可以有 10 多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养老做好储蓄准备;而如果一对夫妇为了潇洒的“两人世界”而延迟生育,就可能把金钱用于消费,对育儿成本估计不足,没有太多储蓄,此后,他们 30 多岁时才开始生育子女,而当子女成人时,夫妇俩可能临近退休,无法做好养老储蓄。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国家的生育年龄都在延迟。据《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数据,在低收入国家,早孕依然是一个挑战。2024 年,有 470 万名婴儿(约占全球婴儿总数的 3.5%)是由 18 岁以下的母亲所生。其中,约有 34 万名婴儿的母亲未满 15 岁,这对年轻母亲及其子女的健康和福祉造成了严重影响。



专栏 1.2 俄罗斯存在人口持续减少的危机

几十年来,逆向人口趋势纠缠着俄罗斯。该国的出生人口远远赶不上死亡人口。目前这次人口危机从 1992 年开始,从 1992 年至 2008 年,俄罗斯总人口从 1.485 亿下降到 1.427 亿,减少了约 580 万人。

① (英)查尔斯·古德哈特、(英)马诺杰·普拉丹:《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廖岷、缪延亮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 年版。

在苏联解体前的 1976—1991 年,16 年间共有 3 600 万人出生,但在 1992—2007 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前 16 年,出生人口只有 2 230 万人,相对减少了 40%。在 1976—1991 年,死亡人口为 2 460 万人,但在 1992—2007 年,死亡人口居然高达 3 470 万人,增加了 40%。

2000 年初,俄罗斯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为孕妇提供饮食营养补助金、医疗服务费用和交通费用,延长带薪产假,生二胎一次性奖励政策等。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人口从 2009 年起呈现缓慢增长趋势。2012 年,年度出生人口终于超过死亡人口,这是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次;出生率上也有进步,从 2006 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1.3 个孩子上升到 2012 年的 1.7 个。2013 年,俄罗斯人均寿命为 71 岁,是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婴儿出生率也基本达到欧洲的平均水平。

尽管取得一些进步,但是人口危机的威胁远远没有过去。同居广泛、结婚率低、延迟结婚年龄、延迟生育年龄等数种现象仍未改变。俄罗斯未来人口增长的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根据预测,未来十年俄罗斯 20~29 岁人口数量会快速减少 50%,与此伴随的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再配合高死亡率(全球第 22 位高),未来人口总量还是会不断减少。据预测,如果没有任何政策措施,到 2050 年俄罗斯人口很有可能缩减至只有 1.13 亿,跟 2015 年 1.44 亿的水平相比下降 20%,而就业年龄段的人口将减少 2 600 万或者更多,直接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国际竞争力下降、繁荣程度锐减。

资料来源:Ilán Berman,《强国寡民:人口危机纠缠俄罗斯,国家未来前景黯淡》,《南方都市报》2015 年 7 月 19 日。



专栏 1.3 房价育儿费居高不下 韩国生育率“欲振乏力”

韩国是 OECD 成员国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05 年 9 月,韩国成立了由总统直管的低生育与老龄社会委员会。自 2006 年起,该委员会负责每五年制定一次“低生育率老龄化基本应对计划”。2006—2022 年,韩国在鼓励生育方面花费了近 280 万亿韩元,但成效不明显。

近年来,生育率仍然持续降低。2023 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0.72。韩国总和生育率从 1974 年起开始下降。1974 年(3.77)和 1977 年(2.99)分别跌破 4

和3,1984年(1.74)降至2以下,2018年(0.98)更是跌破1,之后一路下降,趋势有所放缓。据悲观预期,韩国总和生育率恐将于2025年降至0.61。

韩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首都首尔或京畿地区,那里提供着绝大部分工作机会,而这些地区的高房价和养育费等造成了人们不生育或是推迟生育。首尔的生育率已降至0.59,为韩国最低。生了第一胎的夫妇体验到养育孩子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之后,很多人就放弃生二胎的念头了。

就业难、职场竞争激烈、工作条件僵硬且强度高,导致年轻父母难以实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韩国统计厅分析指出,把大公司作为就业首选的年轻人比重从2021年的21.6%增加至2023年的27.4%。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薪资差距巨大,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许多年轻人为了进入大企业,甚至不惜成为“待业求职者”。

女性收入水平低,而一旦选择生育,很可能迫使其中断职业生涯。过去十几年间,韩国一直是OECD成员国中性别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2021年,韩国的性别薪酬差距为31%,是该组织平均水平(12%)的两倍多。另外,在2019年的韩国双职工家庭中,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3倍以上,但工资水平只有男性的69%。

此外,近年来,韩国晚婚现象越来越严重,晚婚已成为生育率持续下降最直接的原因。2022年,受东亚文化的影响,韩国只有2%的新生儿来自非婚生育。随着女性大学升学率提高,人们结婚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晚。根据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低出生率持续原因与对策课题》报告书,韩国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2.4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9.8岁。由于晚婚,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自然往后推延。韩国统计署的数据显示,2014年,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97岁,是初次分娩平均年龄最晚的国家。

第三节 老龄化与老年人口赡养率的变化趋势

老龄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老年人口的增加是人口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转变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根据2022年7月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年修订版》(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①,全球65岁以上


① 联合国每2~3年对全球人口统计数据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进行一次修订,旨在为大会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提供有关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更为准确的估计,从而为相关政策的调整提供指导。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已由 1950 年的 5.1% 上升至 2020 年的 9.4%，至 2050 年，预估将持续攀升至 16.5%；同时，80 岁以上老人占老年人口比率也将由 2017 年的 1.8% 上升至 2050 年的 4.3%（见表 1.5）。

表 1.5 全球各年龄人口分布及预测 单位：%

年份	0~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1950	34.7	60.2	5.1
1960	37.4	57.6	5.0
1970	37.7	57.0	5.3
1980	35.4	58.7	5.9
1990	32.9	61.0	6.1
2000	30.2	62.9	6.9
2010	27.1	65.3	7.7
2020	25.7	64.9	9.4
2030	23.1	65.1	11.8
2040	21.6	63.9	14.5
2050	20.7	62.8	16.5
2060	19.5	61.8	18.7
2070	18.5	61.4	20.1
2080	17.9	60.3	21.8
2090	17.2	59.9	23.0
2100	16.5	59.5	24.0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 2022.



专栏 1.4 老龄人口与老龄社会的细分

一、老龄人口的分类

虽然 65 岁及以上人口均属于老龄人口，但由于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的年龄差异较大，健康状况、照料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也很大。因此，老龄人口又进一步细化为：

65~74 岁是低龄老人(young-old)；

75~84 岁是高龄老人(old-old)；

85 岁及以上是超高龄老人(oldest-old)。

二、老龄社会的分类

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一个国家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 以上,即称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达到 14%,即称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达到 20%,则称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

资料来源:Riley M W, Riley J. Longev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otential of the added years// Pifer A, Bronte L. *Our Aging Society: Paradox and Promise*.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专栏 1.5 美国各个世代的名称及特点

在中国,人们一般把不同时代的人归为“××后”,比如 80 后、90 后、00 后,而在美国,人们更习惯把不同世代的人按 X、Y、Z 划分(见表 1.6)。不同世代的人口数量差异较大,且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会呈现不同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表 1.6 美国各个世代的名称及特点

世代名称	出生年份	特 点
沉默的一代	1928—1945 年	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低生育率,这一代人口数量锐减。他们往往不太愿意参与激进主义,而更倾向于以事业为中心、对公民参与漠不关心的态度。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一代”,是因为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沉默”。
“婴儿潮”一代	1946—1964 年	这一代人出生人口数量巨大。他们在冷战和越战的阴影中长大,个性鲜明,与其父辈价值观相悖,具有叛逆精神。这一代人接受了极为优质的教育,由于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因而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是美国最富裕的一代人。
X 一代	1965—1980 年	他们是继战后“婴儿潮”后的婴儿低谷期出生的一代,比较热衷于高消费和名牌产品。这一代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衰退中长大,又经历了 21 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就在他们成家立业之际,还要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
Y 一代 (千禧一代)	1981—1996 年	他们是“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也称作回声潮世代(echo boomers)。这一代人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创纪录的失业率直接影响到年轻人就业。
Z 一代	1997—2012 年	他们是第一代真正的“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从小就接触互联网。数字技术与他们的生活无缝对接。

一、世界人口结构的现状与趋势

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退休以后的余命在增加,与此同时,生育率降低造成少子化以及工作人口数量减少,因此,赡养老人的负担成为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日本每年的人均医疗费用随着年龄的增加呈加速上升趋势:64岁以下为17.5万日元,65~74岁为55.3万日元,75岁以上为89.2万日元。^①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虽然延长了,但丧失自理能力的时间段也可能延长,从而大大增加医疗和护理费用。例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因逐步丧失认知功能等而需要大量资源给予照护。尽管医学对导致死亡加快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方面没有太大进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也不太可能给照护老人这个传统领域带来很大帮助。而且照顾老人这种服务完全不同于一般商品,无法通过国际贸易或远程跨国服务来实现。

传统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实现养老保障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有可能出现子女与父母均进入老年的状况,从而削弱子女对父母的支持能力。

二、世界各国老年人口赡养率的现状与趋势

老年人口赡养率(old age dependency ratio,以下简称赡养率)是指领取养老金人口数量(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工作年龄人口数量(20~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② OECD成员国的平均赡养率的上升有加速趋势,从1960年的15.5%上升至1970年的18%,1990年为20.6%,到2020年则攀升至31.2%,预计2050年将达到53.4%。

如表1.7所示,2022年,在OECD成员国中,日本的赡养率最高,达到55.4%,即每100个工作年龄的人要赡养55位老年人,换句话讲,就是每2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赡养率超过35%的国家还有芬兰(41.5%)、意大利(41.0%)、法国(39.3%)、希腊(39.3%)、葡萄牙(39.0%)、德国(38.0%)、拉脱维亚(38.0%)、瑞典(35.9%)、丹麦(35.6%)、爱沙尼亚(35.6%)、捷克(35.3%)、斯洛文尼亚(35.3%)和立陶宛(35.1%)。

虽然老龄化浪潮非常汹涌,但目前已退休的一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代,这一代人在老年阶段较前一代人更加健康,而且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股市与楼市火爆,相对而言,这一代人也更加富有,更有冒险精神。他们的老年生活催生了较为可观的老年消费,对整个社会而言,也不完全是负担。

① (日)吉川洋,《人口与日本经济》,殷国梁、陈伊人、王贝贝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② 关于“工作年龄”的起始年龄,划分标准有一定争议,有的以20岁开始,有的以15岁开始。在许多发达国家,目前领取养老金的最早年龄是65岁,因此,以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作为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由于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几近全民覆盖,所以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基本等同于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

表 1.7 OECD 成员国的老年人口赡养率 单位: %

国家	1992 年	2022 年	2052 年	2082 年	国家	1992 年	2022 年	2052 年	2082 年
澳大利亚	19.3	28.6	43.7	59.1	日本	21.6	55.4	80.0	85.7
奥地利	24.4	32.5	59.0	66.0	韩国	8.6	26.3	82.3	117.0
比利时	25.5	34.0	52.2	63.9	拉脱维亚	21.2	38.0	56.4	60.8
加拿大	18.9	31.7	46.3	59.5	立陶宛	19.4	35.1	56.8	60.9
智利	11.6	20.9	48.6	73.0	卢森堡	21.2	23.5	48.2	59.4
哥伦比亚	8.0	14.5	37.7	64.2	墨西哥	9.1	14.2	34.0	63.1
哥斯达黎加	9.9	17.5	43.7	74.8	荷兰	20.9	34.7	51.0	63.0
捷克	21.9	35.3	49.0	46.3	新西兰	19.6	27.7	44.9	62.0
丹麦	25.7	35.6	44.3	55.9	挪威	28.1	31.3	46.5	61.0
爱沙尼亚	20.7	35.6	57.9	64.7	波兰	18.2	30.3	59.9	68.7
芬兰	22.5	41.5	52.4	69.6	葡萄牙	24.6	39.0	69.7	74.7
法国	24.9	39.3	57.1	68.4	斯洛伐克	18.4	27.3	56.8	62.4
德国	23.7	38.0	59.1	64.8	斯洛文尼亚	18.3	35.3	65.7	66.9
希腊	24.1	39.3	70.7	79.4	西班牙	24.3	33.4	77.2	84.7
匈牙利	23.3	33.2	51.8	57.5	瑞典	30.8	35.9	46.0	60.4
冰岛	19.2	25.5	45.7	64.9	瑞士	23.4	31.8	56.4	62.0
爱尔兰	21.7	25.8	51.2	61.4	土耳其	9.7	14.2	39.3	60.9
以色列	19.3	23.1	31.1	40.9	英国	26.9	33.2	49.1	63.8
意大利	25.4	41.0	78.1	83.4	美国	21.0	29.4	43.4	57.7
					OECD 平均	20.4	31.3	53.8	66.1

资料来源: 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23: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3.

表 1.7 还显示,到 2052 年,将有 16 个国家(含日本)的赡养率超过日本 2022 年的水平。赡养率高于 60% 的国家依次是:韩国(82.3%)、日本(80%)、意大利(78.1%)、西班牙(77.2%)、希腊(70.7%)、葡萄牙(69.7%)和斯洛文尼亚(65.7%)。

在 OECD 成员国中,一些经济水平略低的国家赡养率较低。例如,智利、土耳其和墨西哥的赡养率分别仅为 19.7%、15.2% 和 13.2%。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还不是很,同时伴随着较高的生育率,因此赡养率较低。然而,到了 2050 年,大量的年轻人将变成老年人,这三个国家的赡养率也将大幅提高,分别达到 44.6%、37.0% 和 28.9%。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四个文化传统相近国家的赡养率较低,分别为 29.8%、28.4%、27.7% 和 25.0%。这要归功于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大量引进年轻的移

民,改善了人口年龄结构。而且除了加拿大以外,其他三个国家的生育率都相对较高。

对比 2020 年和 2050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韩国和西班牙的赡养率提高速度最快,分别由 2020 年的 23.6%和 32.8%增长至 2050 年的 78.8%和 78.4%,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急剧下降。韩国将由目前赡养率较低的国家之一跃升为较高的国家之一。

表 1.8 显示了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赡养率现状与趋势。由于生育率较高,预期寿命较短,目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赡养率水平远低于 OECD 成员国平均水平。相对而言,俄罗斯由于较长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水平较低,导致赡养率在几个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

表 1.8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赡养率

国家	1960 年	1990 年	2020 年	2050 年	国家	1960 年	1990 年	2020 年	2050 年
阿根廷	10.1	17.3	20.2	30.3	印度尼西亚	7.6	7.7	10.6	27.3
巴西	7.1	8.4	15.5	39.5	俄罗斯	10.5	17.2	25.3	41.7
中国	7.6	10.2	18.5	47.5	沙特阿拉伯	8.4	6.1	5.3	28.2
印度	6.4	7.9	11.3	22.5	南非	8.4	8.7	9.6	17.4

资料来源: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9*;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对比 2020 年和 2050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这八个国家的赡养率基本上都翻了一番。其中以中国和巴西的老龄化进程最快。2050 年中国的赡养率将达到惊人的 47.5%,这个数据如果拿到 2020 年的 OECD 成员国中对比,可以排到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到 2050 年,预计南非将是最年轻的国家,赡养率甚至低于当前中国的水平,为 17.4%。

需要指出的是,老龄化的冲击不仅仅表现为赡养率指标的恶化。一般而言,年轻人有更长的时间去享受成功的果实,所以更愿意冒险,也较少受传统思维约束,容易产生颠覆性创新;而中老年人不会有很长时间去享受创业成果,因而求稳心态较重。过去 100 年的 300 项最伟大的发明中,72%是由年龄在 30~49 岁的发明者发明的。在这 72%的发明者中,更有 42%是由 30 多岁的发明者发明的。^① 许多学者认为,日本最近几十年经济衰退的原因,很大程度就是创新创业的活力下降。

第四节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编著的《人口学词典》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 10%,或者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 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为“老龄化

^① Jones B F. Age and great inven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

社会”。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我国于 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见表 1.9)。

表 1.9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

普查时间	60 岁及以上人口		65 岁及以上人口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12 998 万人	10.20%	8 811 万人	6.96%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14 408 万人	11.03%	10 045 万人	7.69%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17 765 万人	13.26%	11 883 万人	8.87%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22 182 万人	16.15%	14 374 万人	10.47%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26 402 万人	18.70%	19 064 万人	13.50%

2010—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 和 2.72 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21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0 056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4.2%,意味着中国已经由“老龄化社会”转变成“老龄社会”。

一、我国的三次生育高峰期及其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

我国人口变动的某些特征与美国有相似之处。例如,美国有所谓“婴儿潮”人口,而我国出现过三波人口生育高峰(见图 1.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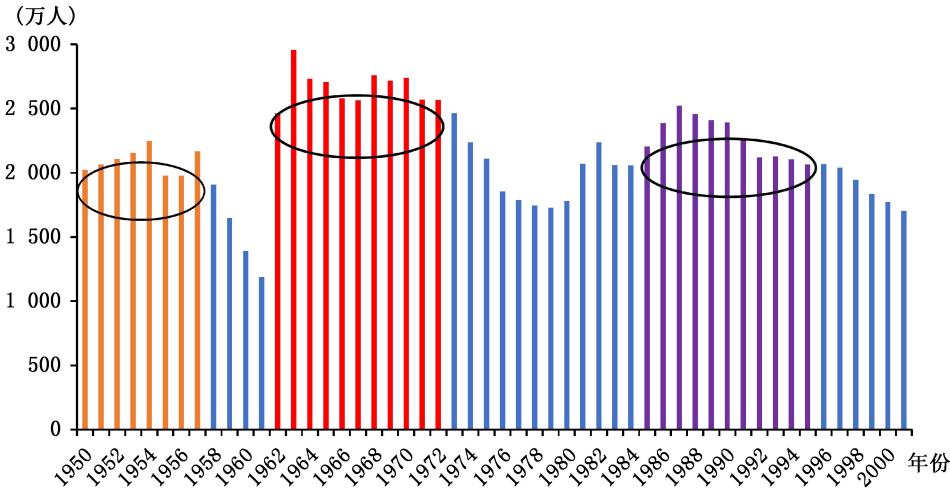


图 1.2 我国的三波人口生育高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版。

① 陈友华:《出生高峰与出生低谷:概念、测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学海》2008 年第 1 期。

第一次生育高峰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7年)。这代人目前已经进入老年人口范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从而形成这次战后的生育补偿。

第二次生育高峰期是1962—1972年。在1958—1961年的三年中,出生率下降主要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不是人们生育观念改变或者是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因此,待1962年社会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之后,就出现了一轮生育高峰。

第三次生育高峰期是1985—1995年。按照现代人婚育的年龄推算,“婴儿潮”之后24~30年会出现回声“婴儿潮”。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在1985—1995年,人口出生率又出现回升。

从1950年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台到1980年,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国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现行法定婚龄始于198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中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1980年调高法定婚龄,无疑有当时控制人口数量的考虑。1982年,计划生育在党的十二大上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我国宪法,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生育率并不高。有人认为,这段时间只能称为人口出生高峰期,不能称为人口生育高峰期。

我国的人口增长与预期寿命的提高,得益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见图1.3)。新中国成立前,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薄弱,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缺医少药,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0000,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新中国成立后,妇幼健康事业面貌焕然一新,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3/100000,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总体上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都将增加,死亡率将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二、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我国从2011年11月起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从2013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从2015年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随着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出台,我国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孩的政策。

虽然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已由节制生育走向激励生育,但出生人口远低于预期(见图1.4)。“全面两孩”政策自2015年实施以来,政策累积效应在前两年集中释放,导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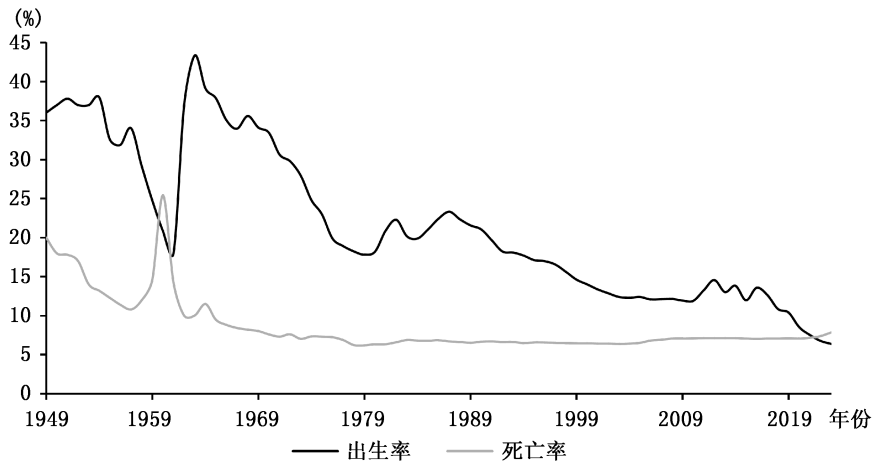


图 1.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年出生率与死亡率

注: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育率呈现先升后降的现象,2018 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18 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受育龄妇女数量和结构影响,2019 年出生人口略有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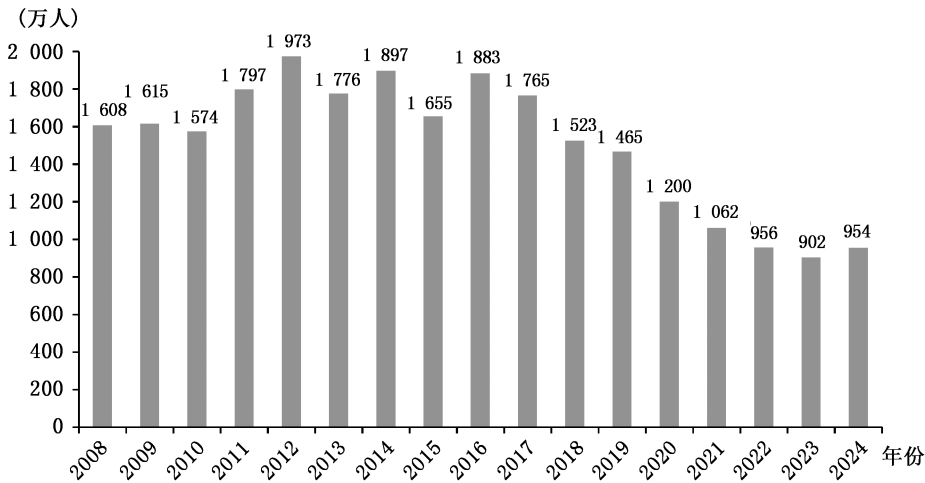


图 1.4 2008—2024 年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国出生人口总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例如,2019 年我国 15~49 岁育龄妇女人数比 2018 年减少 500 多

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另外,生育水平略有下降,也是影响出生人口减少的因素。但从生育孩次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重明显高于一孩,2019年二孩及以上比重达59.5%,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这说明“全面两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

新冠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国际上多项调查研究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有所下降。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韩国出生人口也比上年减少。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结束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迅速进入低生育率时期。这就形成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出生人口数量差异较大。这样的人口分布情况对老龄化进程影响很大,即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达到退休年龄时,意味着大量劳动力退出就业市场,与此同时,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口数量急骤降低,社会既要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又要面临赡养大规模退休人员的挑战。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认为,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在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在25岁之前离世,那就是说,中国将会有1000万“失独”家庭。

三、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

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也在2013年达到最高值以后逐年下降(见表1.10)。2017—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和老年人口增长幅度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1959—1961年出生人口相对较少。随着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大幅下降。因此,对劳动力供给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并非就业人口,人口红利不等于就业红利。一些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员由于长期失业或身体健康原因无法工作,例如一些农民工在建筑、采矿和环卫等领域工作,工作环境较差,又缺乏劳动保护意识,患上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毒、职业性噪声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等以及因工伤残,职业生涯特别短;人口红利未充分挖掘,一些人员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事体力型工作,收入较低;一些人员的退休年龄是50岁或55岁,在领取养老金以后就选择不再工作。当然,也有不少65岁及以上的人员仍在就业之中。2018年末我国15~64岁人口总量为99357万人,就业人员为

77 586 万人,仅占前者的 78.09%。^①

表 1.10 2010—2023 年我国各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年份	0~14 岁人口 占比(%)	15~64 岁人口 占比(%)	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	15~64 岁人口 总量(万人)
2010	16.60	74.53	8.87	99 938
2011	16.50	74.40	9.10	100 378
2012	16.50	74.10	9.40	100 718
2013	16.40	73.90	9.70	101 041
2014	16.50	73.40	10.10	101 032
2015	16.50	73.00	10.50	100 978
2016	16.70	72.50	10.80	100 943
2017	16.80	71.80	11.40	100 528
2018	16.90	71.20	11.90	100 065
2019	16.80	70.60	12.60	99 552
2020	17.90	68.60	13.50	96 871
2021	17.47	68.33	14.20	96 526
2022	16.94	68.21	14.86	96 289
2023	16.36	68.26	15.38	96 228

注:阴影部分的数据表示该指标呈现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年版。

我们还要看到,就业红利不一定能够为养老形成足够的储备。日本、韩国以及亚洲四小龙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高速发展时,其人口红利正好与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相匹配,电子产品的利润率较高,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回报较高。但在我国劳动力充沛时,从“微笑曲线”上看,制造业的高利润并没有留在国内。西方国家基本上放弃了电脑、电视、冰箱、空调、智能手机等市场,部分技术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例如,IBM 将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联想,日本松下、索尼、夏普基本上剥离了家电业务,部分产品及技术出售给了中国海尔等企业。西方企业只掌控核心技术及产品,如苹果手机、高通芯片、索尼镜头等。这种生产分配格局制约了我国的人口红利。

需要关注的是,我国的劳动力队伍在总量变化的情况下,还出现了老龄趋势引发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将 15~64 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划分为三组。一是 15~24 岁年龄组

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青年组)。这个青年劳动群体往往缺乏就业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工作经验和劳动参与率逐年提高。二是 25~49 岁年龄组(中年组)。这一群体的工作适应能力最强,劳动参与率最高。三是 50~64 岁年龄组(大龄组)。这个大龄劳动者群体中虽然也不乏就业经验丰富的劳动者,但总体就业能力偏低,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趋向更低。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年组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在 2000 年为 61.8%,在 2010 年大幅度降低到 42.5%,在 2020 年为 49.0%。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匹配能力最强的人口趋于相对减少。同时,大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加快增长,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趋于提高,并将在 21 世纪中叶之前始终保持这个趋势。^① 劳动力队伍的结构变化将导致劳动者技能更新的能力总体上趋于弱化,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也会降低,这将使我国结构性就业的矛盾更加突出。



专栏 1.6 刘易斯拐点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 1954 年提出了拐点理论,用以解释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工资是如何保持低位的。从此以后,该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小虎”的发展轨迹。据刘易斯解释,在工业化启动之初,劳动力由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重新分配有助于推动快速增长。但这种发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业所有者,因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深潭”确保了薪资保持低位。这种格局解释了中国经济的特征: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推高社会总储蓄率;资本方因劳动力廉价,获利丰厚,投资率高得异常。然而,最终劳动力会出现短缺,城市雇主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劳动力离开家乡农村。企业利润、出口竞争力和资产价格下降。

一、第一次人口红利

通常我们将人口按年龄区分为 0~14 岁的“幼年人口”、15~64 岁的“经济劳动力人口”或“工作人口”,以及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这三个年龄群比例的变化即可看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抚养比(或称依赖比)即其中一项人力指标,其又可以区分为扶幼比(幼年人口数/工作人口数,又称少儿抚养比)与扶老比(老年人口数/工作人口数,又称老年抚养比),扶幼比加上扶老比就是所谓的“抚养比”,数值愈高,则代表负担愈重。

^① 蔡昉:《解析中国城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2024 年第 3 期。

我国在 2000—2022 年的扶幼比、扶老比情况见图 1.5。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呢？当然是抚养比愈低愈好，于是有所谓的“人口红利”(population dividend)，通常以抚养比低于 50% 来定义，即抚养人口数与工作人口数的比值低于 50%，换句话讲，就是工作人口数占总人口至少 66.7%，而抚养人口数低于 33.3%。1990 年，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2010 年，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 年，抚养比下降到最低值(34.17%)，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至 2030 年前后将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至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 年抚养比将达到 62% 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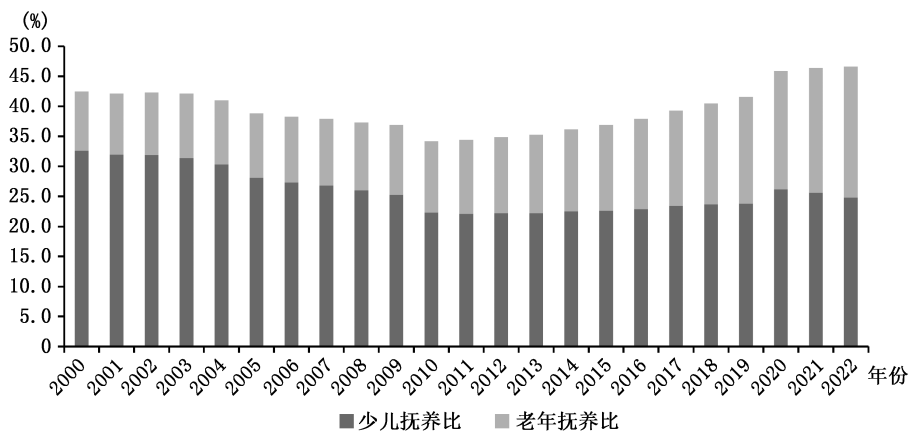


图 1.5 2000—2022 年我国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3 年版。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

当人口趋向老年型社会时，存在潜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由老年人口较强的储蓄动机而形成的储蓄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函数，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存在无限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故而生产将可能出现边际报酬递减而导致经济产出增长不可持续。随着人口进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质量不断提升，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将达到更高的水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也将处于较高水平。由人力资本投入所形成的劳动力内涵发展将削弱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以助于经济增长，即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挖掘出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例如，整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健康水平，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向积累型模式转变来推动经济增长。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未城先老”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1982年是20%，2000年是35%，2019年首次超过60%，2023年为66.2%。然而，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我国的城市化集中发生在1990—2010年这20年里，早期城市化到现在才刚刚经过一代人，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和城市人口结构在短期大规模人员流动后形成巨大差异。简单说，就是农村剩下的人口偏老，城市人口偏年轻。预计农村和乡镇的老龄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50年将占有所有老龄人口的50%，数量巨大的老年人在农村养老，与子女异地居住，其收入来源、照料看护、医疗保健等存在较大的挑战。

虽然单纯从比例来说，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会进一步上升至70%~80%，甚至超过80%，但这不会通过农村人口进城来完成。农村偏老的人口逐渐自然死亡，新出生人口（虽然越来越少）主要在城市，这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二)“未富先老”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2021年的78.2岁，翻了一番还多。^①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奇迹。国际规律是人均GDP越高，人均预期寿命越高。但中国打破了这个规律。以中国1980年的GDP水平，按国际规律计算，人均预期寿命应该是50多岁，但实际达到了67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水平。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影响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

2020年，我国人口数量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8.47%。我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是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形成了体系化的产业链和全球化的供应链，建成了一批规模化的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奉献，也得益于我国处在人口红利的机遇期。可以说，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世界产业的转移，解决了发达国家劳动力减少的难题，保障了全世界的经济稳定与民生福祉。相应地，中国的老龄化对全球各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制造业产能下降，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迄今我们还看不到世界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① 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在劳动力数量、产业链衔接上能接受中国的产业转移。

五、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展望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业部人口司《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中的方案预测 (medium variant), 中国人口将持续下降并呈加快趋势, 人口减少幅度大约每 10 年增长 1 个百分点, 到 2050 年全国总人口降到 12.60 亿人, 到 2100 年则只有 6.33 亿人, 不到 2024 年人口数量的一半 (如图 1.6 所示)。世界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高于预期, 在此前联合国发布的《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中, 中国 2100 年的人口总量预测值为 10.65 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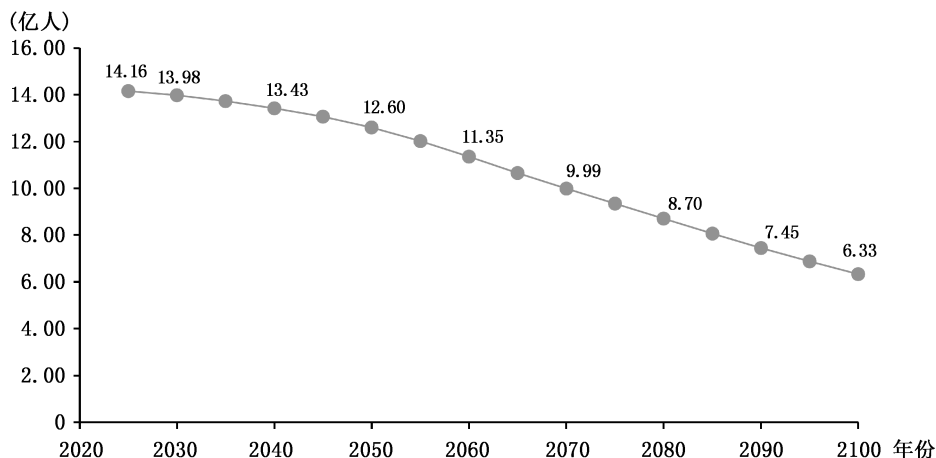


图 1.6 中国人口预测值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Data Sources. (UN DESA/POP/2024), 2024.

目前关于人口预测存在一些争议。例如, 梁建章、易富贤等认为, 我国未来的人口数量将远低于联合国的预测值, 应大力鼓励生育, 减轻老龄化的冲击。^① 人口预测决定了我国的生育政策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适度控制的人口数量有利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 适度扩张的人口规模则有利于减轻老龄化负担, 且可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创新。^② 因此, 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矛盾, 需要寻求一个平衡。

如表 1.11 所示, 按老龄化比重进行排名, 2025 年我国为 14.9%, 低于七国集团所有国家; 到 2030 年, 我国老龄化比重将接近美国 2025 年的水平, 但仍低于七国集团; 到

① 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中国人可以多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易富贤:《大国空巢: 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 梁建章、黄文政:《人口创新力: 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

2050 年,我国的老龄化比重将达到 30.9%,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在 8 个国家中位列第三;到 2070 年,我国的老龄化比重将超过七国集团所有国家。

表 1.11 我国与七国集团的老龄化比重展望 单位: %

年份	世界	中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美国
2025	10.4	14.9	20.3	22.5	23.7	19.7	25.1	30.0	18.4
2030	11.8	18.3	22.5	24.4	26.5	21.0	28.0	31.1	20.4
2035	13.1	22.8	23.7	25.9	28.9	22.4	31.3	32.7	21.5
2040	14.3	26.6	24.4	27.0	29.6	23.4	34.2	35.4	22.0
2045	15.2	28.5	25.0	27.4	29.9	23.9	36.1	36.8	22.5
2050	16.3	30.9	25.7	27.6	30.3	24.7	36.8	37.5	23.1
2055	17.6	34.8	26.5	27.6	30.7	25.4	37.0	37.6	23.9
2060	18.5	37.3	27.4	27.3	30.6	26.3	36.8	37.4	24.6
2065	19.3	38.6	28.3	27.2	30.2	26.9	36.2	37.0	25.0
2070	20.0	39.9	28.9	27.7	29.8	27.3	36.1	36.8	25.7
2075	20.9	42.0	29.5	28.7	29.7	28.4	36.7	37.1	26.7

注:老龄化比重=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全部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Data Sources*. (UN DESA/POP/2024), 2024.

➔ 拓展阅读

人口赡养比、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

老龄化程度与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一些人员没有参保,尽管已超过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但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不会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支出压力。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高于全国从业人员数量,而全国从业人员数量又高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数量。

我国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参保覆盖面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参保率逐年提高。在扩面的过程中,新参保的人员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因此,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养老金领取者数量/在职参保者数量)低于全部人口的赡养比。

从图 1.7 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来看,虽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但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的制度赡养比基本没有变化,原因在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有许多来自农村的新职工源源不断地加入,从而改善了年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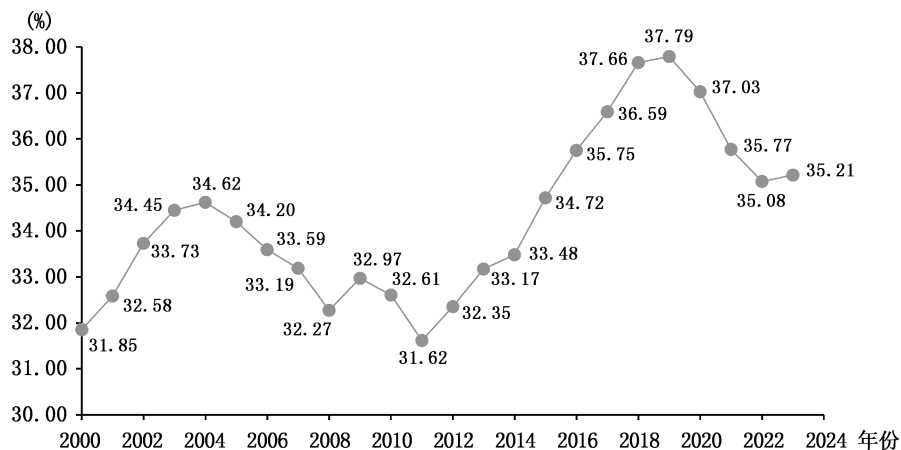


图 1.7 2000—2024 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

注:制度赡养比=城镇企业养老保险退休职工数量/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数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年版。

复习思考题

1. 在西方七个工业化大国中,为何日本的老龄化最严重?
2. 有人认为,人类社会目前存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现象,从社会的总抚养率来看,少子化减轻了社会支出压力,老龄化加重了社会支出压力,两个互相抵消,社会支出的压力并没有发生变化。你认为这一说法是否有道理?
3. 当前社会存在一些对老年人不甚友好的规定或惯例。例如,一些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无法通过网络购物或获取商家优惠;60 岁成为租房年龄分界线,不少房东和房产中介机构不接受 60 岁以上的老年租客作为独立的承租人;一些互联网平台不愿意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外卖配送员或司机等就业岗位;一些旅游公司规定 60 岁以上游客参团需要有家人陪伴,在无子女陪伴情况下,原则上不接受老龄游客,即使有直系亲属陪伴,老龄游客还需提交一系列证明,如“身体状况告知书”“直系家属承诺书”等。试从公共管理角度分析,如何在保障老年人权益和商家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4. 梁建章、黄文政在《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一书中谈到,在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中,非婚生子女仍然是社会禁忌,例如,在日本和韩国,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只有 2%和 2.1%。2019 年 3 月 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提交《关于抓紧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及不再鼓励晚婚晚育的建议》,获得了较

为广泛的关注。其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请分析调低结婚年龄的利弊,试判断这一调整对提高我国的生育率有无帮助。

5. 通常情况下,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会引起其他相关政策的调整。例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期限可计算到借款申请人法定退休年龄后 5 年,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68 周岁,贷款期限最长为 30 年。试分析延迟退休政策的利弊。

6. 你认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支出高峰期将在何时出现?

第二章 家庭的小型化与社会保障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础。传统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功能。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其铭语是“在社会核心建立最小的民主体制”。联合国有关机构又确定以屋顶盖心的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昭示人们用生命和爱心去建立温暖的家庭。国际家庭年的宗旨是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各政府机构制定、执行和监督家庭政策。

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作出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Families)。设立“国际家庭日”旨在改善家庭的地位和条件,加强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的国际合作。

第一节 各国的家庭组成情况及发展趋势

正如《家和万事兴》《相亲相爱一家人》《常回家看看》等歌曲所描述的,家庭保障是社会保障的有力支柱,能够直接有效地助力于社会安定。然而,在现代社会,家庭本身面临小型化、流动化,对家庭成员的保障作用有所削弱。近年来,剩男剩女、择偶难、离婚、恐婚、不婚、不育、同居热成了许多相声、小品的重要题材,反映出社会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一些研究认为,家庭成员的数量减少,导致家庭内部的互济功能削弱,人们在创新创业方面趋向保守,更多地追求收入的稳定性。在现代社会,既需要继续提倡家庭的保障功能,也要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以应对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

一、家庭结构的变迁

(一)从传统家庭到核心家庭

在过去传统的农业社会,为了配合农业生产,家庭多是几代同堂或亲族聚居的大家庭模式。其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渐渐转移至工业方面,于是大家庭模式

亦开始转化为一夫一妻及其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我们称之为“现代家庭”。伴随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以及高技能水平人士在不同地域间流动,传统的大家族聚居现象越来越少,这一变化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家方圆8公里以内住着12位姑伯姨舅,而在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周围没有一个这样的亲戚。”^①

核心家庭的风险通过福利国家的制度得到保障。因为有养老金,老年人在经济上独立于子女家庭,而子女家庭也因养老保险制度弱化了对父母的经济方面的赡养责任,经济的自立程度进一步增加。然而,这些自立是有代价的。在传统社会,老年人丧偶并不意味着就失去了家庭;而在核心家庭时代,老年人丧偶就意味着失去了家庭。这种现象催生了对现代国家社会服务的新的需求。

(二)从核心家庭到后现代家庭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个人开始从核心家庭中脱离出来。在现今繁荣的大都市,制造业比重降低,服务业大行其道,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减少,对女性的就业限制有所减少。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的普及,大大缩减了女性在家务中所耗费的时间。此外,女性主义高涨,强调男、女两性的平等,同时,女性的教育水平也在逐渐提升。于是,女性纷纷外出工作,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而不再依赖于家庭。

在后现代社会,除了离婚率持续攀升之外,再婚的比率也相继提高,再加上部分人群有“结婚恐惧症”,于是便出现不少单亲家庭、多段婚姻的继亲家庭、无子女家庭和单身贵族。后现代家庭的特质是不确定和多种关系,学者无以名之,则称为“后现代家庭”(post-modern families)。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独身、迟婚、离婚、单亲、多元的家庭模式已成为这个后现代社会的特色。以英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家庭形态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2.1):非婚生子女、婚前同居、晚婚现象越来越多,同时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最后导致单亲家庭数量增加、独居人数增加、家庭成员平均数量减少。家庭形态更加多样化,一个成年人可能在独居、单亲、同居、结婚、离婚、再婚、生育多子女等状态间切换。家庭形态也随着区域、民族和收入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无法简单用一种家庭形态反映人们实际所处的所有家庭状态。

现代社会为单身者群体提供了大量服务,事实上也削弱了家庭的功能。例如,传统家庭成员一般在下班后共进晚餐,晚餐为家人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机会。而随着快餐的流行,许多年轻人不再回家吃晚饭,对家庭的认同感也随之削弱。

由于离婚和同居占比增加,加上生育率趋低,因而当前各国家庭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的家庭开始增多。有些孩子只随父母中的一位共同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① (英)保罗·科利尔:《资本主义的未来》,刘波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了家庭保障功能。例如,1999年,法国颁布了《民事互助契约》(PACS),规定长期一起生活的成年人拥有与婚姻关系同等的社会权利。之后,法国非婚生子女数量增加,出生率上升。2007年以来,法国非婚生子女比例达52%以上,已超过婚生子女数量,占据主流。这些非婚生孩子的母亲大多不是单身母亲、未成年母亲或贫穷的母亲,相反,各种社会背景和经济阶层的人都有,她们大多是自愿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的。前法国女司法部长拉齐达·达蒂在任时未婚怀孕,她在法国国内的民众支持率不降反升,大部分法国民众及媒体不仅对她大加同情,还自动组成“沉默阵线”,约定不为满足大众好奇心而不择手段去“挖”达蒂孩子的父亲。

表 2.1 30 多年来英国的家庭形态和家庭结构变化

指 标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20 世纪 10 年代中期
非婚生子女比例(%)	8	47
单身女性同居比例(%)	8*	31
女/男第一次结婚的中位者年龄(岁)	21/24	30/32
15~44 岁女性的堕胎数量(个)	161 000	190 800
生育率(每千名女性)(%)	84	93
离婚数量(个)	79 000	118 140
离婚率(每千个已婚人口)(%)	5.9	10.8
单亲家庭所占比例(%)	8	25
独居家庭所占比例(%)	18	28
家庭成员的平均数量(个)	3.1	2.4
16 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	25	19
65 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	13	17

注: * 为 1979 年数据。

资料来源: Alcock P, May M, Wright S.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6.



专栏 2.1 日本政府推行女性经济学但成效不佳

日本妇女的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低于欧美,且比欧美长寿 5~6 岁,年轻时“不养人”,年老时“要人养”。日本政要对此很恼火,他们既要妇女干活,又要妇女生娃。前首相森喜朗认为,不生育的妇女是不负责任地享受“自由”,不应享受养老金。十多年前,日本就提出要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作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致力于鼓励女性进入职场,以此抵消日本的低生育率及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问题。

2015年8月28日,日本上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日本所有公有企业及私营企业在2016年4月前为招聘及提拔女性员工设立具体数字目标。9月27日,安倍在联合国就性别平等问题发表演讲,声称计划在2020年将政界和商界中女性领导者的比例提升至30%。同年12月,安倍就将30%的目标猛砍至7%,宣告该政策基本破产。

二、世界各国的家庭组成情况

2012年,在OECD成员国的家庭组成中,结婚是最普遍的家庭存在形式(占全部家庭数量的52.43%),其次是从未结婚(27.13%),然后是同居(7.87%),再接下来分别是鳏寡(6.22%)、离婚(4.86%)、分居(1.5%)。各国的家庭形态情况差异较大(见表2.2)。

表 2.2 2012 年 OECD 成员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家庭形态占比 单位: %

国家	结婚	同居	从未结婚	鳏寡	离婚	分居
土耳其	66.26	0.15	27.09	4.27	1.84	0.40
日本	65.39	0.22	23.41	7.79	2.83	0.36
意大利	63.53	1.99	23.68	5.95	2.00	2.86
葡萄牙	62.96	2.22	24.90	6.61	3.11	0.21
希腊	60.73	0.13	26.53	9.07	3.07	0.47
以色列	59.93	0.10	32.09	3.18	4.58	0.12
西班牙	56.36	3.99	29.86	4.58	3.26	1.95
波兰	56.12	0.88	28.20	9.45	4.26	1.09
韩国	55.77	0.24	38.61	3.46	1.34	0.59
捷克	55.58	2.49	24.89	5.23	11.06	0.75
奥地利	55.03	6.97	24.51	5.83	7.00	0.66
瑞士	54.92	3.31	27.54	4.98	7.52	1.73
卢森堡	54.70	6.26	25.56	4.69	7.05	1.74
澳大利亚	54.40	9.90	23.90	5.04	4.04	2.72
爱尔兰	54.07	4.54	33.41	4.51	1.21	2.26
美国	52.52	1.24	30.82	4.86	8.13	2.43
OECD 平均	52.43	7.87	27.13	6.22	4.86	1.50
荷兰	52.23	10.80	28.74	3.68	4.28	0.27

续表

国家	结婚	同居	从未结婚	鳏寡	离婚	分居
德国	51.51	5.50	26.18	9.18	6.40	1.24
冰岛	50.63	21.00	23.36	2.44	1.85	0.73
英国	50.56	10.44	22.41	7.20	6.79	2.61
比利时	50.40	10.81	24.89	7.80	5.72	0.38
斯洛伐克	50.36	3.41	30.07	10.18	5.56	0.42
加拿大	49.38	9.05	28.36	4.68	5.22	3.31
斯洛文尼亚	49.37	14.50	25.83	6.67	2.80	0.82
墨西哥	49.11	11.28	28.49	5.70	2.29	3.13
新西兰	48.63	13.30	26.73	4.50	4.67	2.18
挪威	48.31	16.90	24.11	5.32	4.44	0.91
法国	47.52	12.26	24.46	7.71	5.77	2.28
丹麦	45.46	12.32	27.49	7.66	6.22	0.86
芬兰	44.88	11.11	27.36	6.18	10.25	0.22
匈牙利	44.50	12.38	21.58	13.33	6.59	1.62
瑞典	42.40	19.36	26.73	4.08	5.13	2.31
智利	41.19	9.74	37.97	5.13	1.15	4.82
爱沙尼亚	37.80	18.65	22.65	10.62	7.76	2.52

注:数据根据 Gallup World Poll (www.gallup.com)的调查结果得出。

资料来源: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4*; *OECD Social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4.

从表 2.2 的数据可以得出:

(1)同居已成为北欧国家中长期伙伴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北欧国家,人们推迟并经常以同居关系取代婚姻。^①例如,在瑞典,处理同居关系的规则主要来自 2003 年出台的单行法《同居法》,与专门调整狭义婚姻关系的《婚姻法》并立。此外,近年来“分开同居”(living apart together, LAT)现象也有所增多。“分开同居”有时称为“走婚”,是指伴侣间保持亲密关系但并不住在一起的现象。据统计,在英国约有 10%的成年人选择分开同居的生活方式。这一数字相当于所有未婚或未同居人口的 1/4。而在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等欧洲国家,选择这种同居方式的人数也保持着类似的比例。

^① 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9*; *OECD Social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2)结婚率在各国差异较大。2012 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结婚率最高;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结婚率排名第二,也超过了 65%;而智利和爱沙尼亚的已婚人士占比仅有 40%左右。

(3)一般而言,在低结婚率的国家,同居人群的占比较高。例如,爱沙尼亚、冰岛和瑞典大约有 1/5 的成年人处于同居状态。反之,在土耳其、日本等结婚率较高的国家,同居人群的占比仅为 0.15%~0.25%。

(4)在一些国家中,从未结婚的人群占比较高。例如,在智利、韩国,每 10 位成年人中大约有 4 位从未结婚;在爱沙尼亚、匈牙利、英国等国家,这一占比也超过了 1/5。

(5)丈夫挣钱养家、妻子在家料理家务的传统家庭模式已经不再流行。以英国为例,这类家庭总量占英国有子女家庭总量的比例已低于 1/4。^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英国仅有 50%的已婚母亲就业。在当时,已婚女性通常会花几年时间照看年幼的小孩,等小孩大一些以后再就业。而在 2010 年,已婚母亲的就业率达到了 3/4。

(6)生育率下降导致家庭人口数量减少,老龄者独立(独自或与其配偶)生活趋势日益普遍,并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正相关。目前全球约有 40%的老龄人口是独立生活的,预计未来此一比率仍将呈上升趋势。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令这个问题暴露无遗。在这场地震及海啸双重灾难中,死亡人数约 15 800 人,而 60 岁以上的死者人数占可统计死亡人数比例高达 64.4%。^② 此次受灾的很多沿海城镇多年来人口一直在减少,因为许多年轻人已前往大城市寻找工作了。

在发展中国家,家庭结构的差异也很大。如表 2.3 所示,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超过 70%以上的成年人是已婚的;而在南非,仅有约 25%的成年人是已婚的。在表 2.3 所列国家中,仅有巴西、阿根廷的同居人口比重超过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离婚人口的比重高达近 9%,仅低于捷克和芬兰,高于其他 OECD 成员国。

表 2.3 2012 年部分发展中国家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家庭形态占比 单位: %

国家	结婚	同居	从未结婚	鳏寡	离婚	分居
中国	78.97	0.27	17.77	2.18	0.62	0.19
印度	70.74	0.14	23.26	5.13	0.42	0.31
印度尼西亚	70.53	0.06	22.97	4.72	0.98	0.74

① Pete Alcock, Margaret May, and Sharon Wright.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2.

② 丁英顺:《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老龄化社会的冲击及启示》,见李薇、高洪、林昶《日本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续表

国家	结婚	同居	从未结婚	鳏寡	离婚	分居
俄罗斯	50.78	2.54	22.37	12.16	8.94	3.21
巴西	45.35	8.67	34.85	4.58	3.25	3.31
阿根廷	36.92	17.18	31.48	7.61	1.16	5.66
南非	26.70	3.53	56.22	7.64	3.09	2.81

注：数据根据 Gallup World Poll (www.gallup.com)的调查结果得出。

资料来源：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4* ; *OECD Social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4.

三、各国的结婚率与离婚率

从长期趋势来看，各国的初婚年龄持续增长，结婚率呈下降趋势（见图 2. 1）。1990—2016 年，在 OECD 成员国中，只有瑞典和土耳其的结婚率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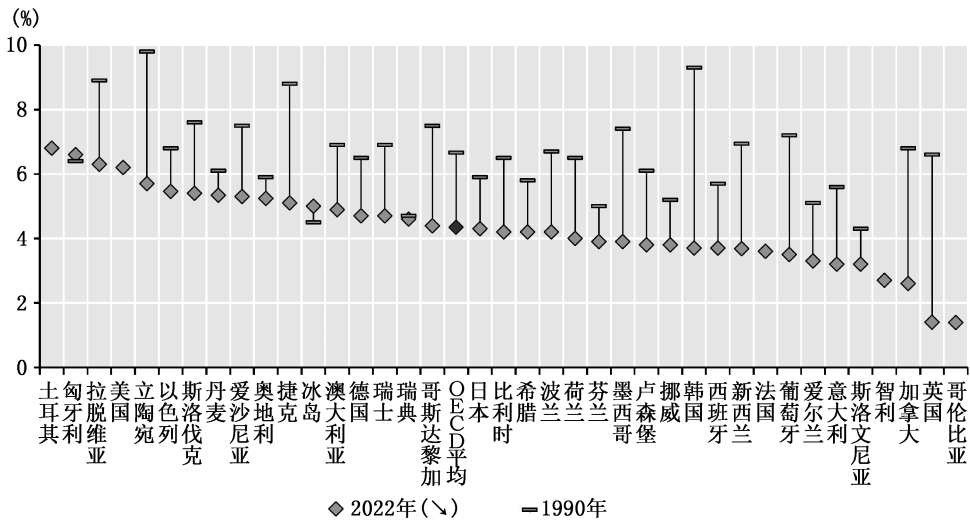


图 2.1 OECD 成员国 1990 年与 2022 年结婚率对比

资料来源：OECD Family Database-Indicator SF3. 1-based from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s and Eurostat-<http://oe.cd/fdb>.

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适婚年龄人口比例的降低。一方面，各国正在逐渐进入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加大的社会，人均寿命延长，总人口基数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适婚年龄人口（其中主要是青年）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在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导致结婚率下降。终身未婚的人中大部分是没有正式工作的男性和有正式工作的女性。从男性的角度看，选择不结婚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能

结婚的”,而女性则是考虑“不能与没有固定收入的对象结婚”。同时,女性就业以后,若收入稳定,就不再需要通过婚姻来保障生活。

此外,结婚率下降与初婚平均年龄后延也有较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人们的教育、就业、结婚、生育等社会化行为相应延后了。

2016年,OECD成员国的平均粗结婚率为4.8(见表2.4)。各国间差异很大,排名前三国家的结婚率是后三名国家结婚率的2倍。

表 2.4 2016 年 OECD 成员国的结婚率与离婚率 单位:‰

国家	结婚率	离婚率	国家	结婚率	离婚率	国家	结婚率	离婚率
土耳其	7.5	1.6	日本	5.0	1.7	墨西哥	4.4	1.0
立陶宛	7.4	3.1	瑞士	5.0	2.0	英国	4.4	1.7
美国	6.9	3.2	澳大利亚	4.9	1.9	新西兰	4.3	1.7
拉脱维亚	6.6	3.1	OECD 平均	4.8	1.9	比利时	3.9	2.1
以色列	6.4	1.7	捷克	4.8	2.4	荷兰	3.8	2.0
韩国	5.5	2.1	爱沙尼亚	4.8	2.5	西班牙	3.7	2.1
斯洛伐克	5.5	1.7	爱尔兰	4.8	0.7	法国	3.5	1.9
丹麦	5.4	3.0	希腊	4.6	1.0	智利	3.4	0.1
瑞典	5.4	2.4	冰岛	4.6	1.6	意大利	3.4	1.6
匈牙利	5.3	2.0	芬兰	4.5	2.5	卢森堡	3.2	2.1
奥地利	5.1	1.8	挪威	4.5	1.9	斯洛文尼亚	3.2	1.2
波兰	5.1	1.7	加拿大	4.4	2.1	葡萄牙	3.1	2.2
德国	5.0	2.0						

资料来源: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9: OECD Social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9.

各个国家的粗离婚率也有所不同。2016年,智利的离婚率低至0.1‰(在智利,离婚从2004年开始才合法化),而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美国的离婚率高于3‰。

1990—2014年,离婚率变化情况好坏参半:20个OECD成员国的离婚率上升,而其他16个国家的离婚率下降。在美国,离婚率下降最为明显,从1992年的4.8‰降至2016年的3.2‰,而西班牙的离婚率增幅最大,从1990年的0.6‰上升至2016年的2.1‰。虽然经济原因容易导致家庭破裂,但是离婚成本高昂以及家庭具有互济性和降低生活成本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离婚率的下降势头。

预期寿命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离婚率。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共同生

活 15 年以上的离婚情况持续增多,占总离婚数的近三成。^① 尤其是共同生活 20 年以上的“熟年离婚”比例逐年上升,2015 年的熟年离婚率是 1947 年的 5.8 倍。同样,那些携手走过了银婚、共同生活了 25 年以上的老夫老妻们的离婚率也在逐年上升。



专栏 2.2 粗结婚率与粗离婚率

粗结婚率(crude marriage rate)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年度)某地区结婚登记对数与年平均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即在一年内每千人中有多少对结婚。

粗离婚率(crude divorce rate)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年度)某地区离婚数与年平均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

实际上,测量离婚最科学、直观的方法应采用“一般离婚率”的概念,它反映的是每 1 000 对夫妇(通常以有偶女性人口代替)中的年离婚数,也称“已婚人口离婚率”。因为这一计算方法排除了不具离婚风险的儿童以及成年未婚、丧偶和离婚人口,而以该地区所有的已婚人口为基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该地区某一时期婚姻解体的实际概率,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特征的离婚率测量指标。然而,由于已婚人口数只是在人口普查的年份才能获得,因而已婚人口离婚率不适宜作年统计。

四、我国人口的婚姻现状及趋势

如图 2.2 所示,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适婚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并且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经济独立性增强,我国结婚率在 2013 年达到 9.9‰的最高点之后,持续下滑。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男性比女性多了 3 000 多万人,我国的男女性别比失衡也加剧了结婚的难度。

我国初婚年龄也有推后的趋势。我国的结婚年龄拐点出现在 2013 年。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3 年 25~29 岁年龄段结婚人口占当年结婚登记数的比重首次超过 20~24 岁年龄段,达到 35.2%,显示出晚婚年龄段人口数量开始相对上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2020 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升至 28.67 岁,其中男性为 29.38 岁,女性为 27.95 岁。数据显示,十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 4 岁。目前,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平均初婚年龄突破 30 岁大关。2021 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 33.31 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 31.89 岁、女 30.73 岁。

① (日)荒川和久:《超单身社会》,郭超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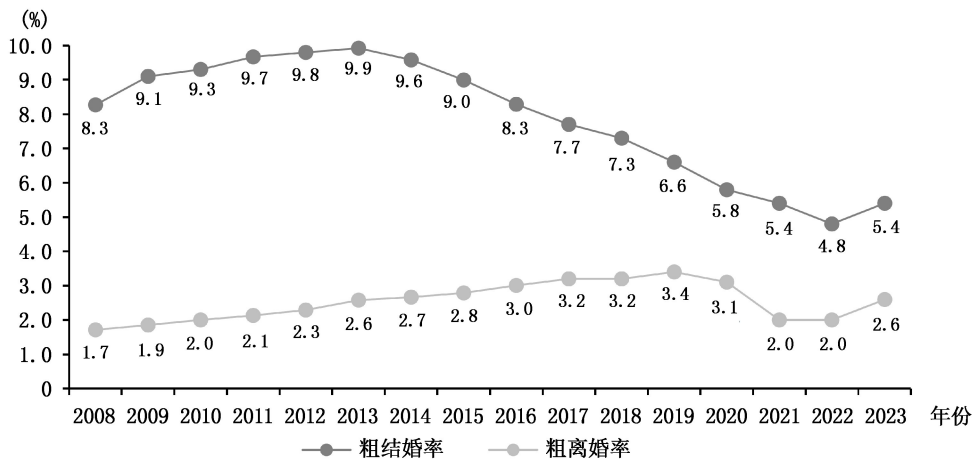


图 2.2 我国的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

资料来源: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不过,补证也是导致婚龄升高的原因之一。例如,2017 年,扬州有 43 597 对新人领“红本本”,其中 17 343 对是补证的,占到了近四成。近些年,出于领取独生子女奖励、购房、出国旅游等多种需要,很多找不到结婚证的老人去补证,这就导致平均初婚年龄被拉高了。

与此同时,我国的未婚率也有逐年增长趋势,但绝对值仍然较低。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市 30 岁及以上未婚女性在同年龄女性中的占比高达 3.66%,比 10 年前增长了 50%,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显著增多。^① 然而,通过分析各年龄段青年群体的婚姻状况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未婚比例逐年下降,30~34 岁未婚女性占比为 12%,而 35~39 岁和 40~44 岁未婚女性占比则分别降至 6%和 3%。

通常而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会导致更多女性选择晚婚或单身。中国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至 2020 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 159.9 万人,占比达到 50.9%,比 2010 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 1 674.2 万人和 450.6 万人,占比分别为 51.0%和 58.0%,分别比 2010 年提高 0.1 个和 4.9 个百分点。

我国曾经出现过几次单身潮。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全国出现了离婚潮。20 世纪 70 年代末,知青为返城而离婚,引发了第二次单身潮的出现。如今,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单身潮又

^①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年版。

一次显现。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逐年递增,到2020年开始有所下降(见图2.2)。近年来,一些城市的房产限购政策以及二手房出售的税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假离婚的增加。

2001年,民政部开始披露“民政部门登记离婚”与“法院调解和判决离婚”的统计数据。2001年和2002年,法院调解和判决离婚超过民政部门登记离婚。但从2003年至今,登记离婚一路赶超法院调解和判决离婚,2014年登记离婚是法院调解和判决离婚的3.8倍。^①

第二节 家庭成员的数量及变化趋势

自工业革命起,家庭的生产职能越来越弱。在17世纪的英国,家务劳动可能包括酿酒、乳制品生产、养鸡养猪、水果蔬菜种植、纺织、医疗护理等,我们在偏远的农村依然可以看到家庭妇女从事诸多类似的活动。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些生产活动转变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职业,人们需要花钱来购买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家务劳动的内容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当下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家务劳动变得越来越轻松。这使得家庭存在的必要性有所减弱,个人在许多时候不需要依赖于家庭或婚姻来实现各种目标。

各国家庭的情况差异很大,而且家庭成员的数量也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变化。

(1)各国家庭成员的平均数量差异很大(见图2.3)。在21世纪00年代中期,瑞典的家庭成员平均数量在2人左右,而土耳其、墨西哥在4人左右。

(2)各国家庭成员的平均数量呈下降趋势。一些现代家庭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标,从而出现了无子女的“丁克家庭”(double-income-no-kid, DINK)。在有统计数据的OECD成员国中,除卢森堡有所增加、荷兰几乎无变化外,其他国家在21世纪00年代中期的家庭成员平均数量均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如英国从2.44人降至2.12人,降幅达13.16%。

(3)富裕的家庭往往拥有更多的家庭成员。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的经济学家米歇尔·考克斯(Michael Cox)和理查德·奥姆(Richard Alm)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最富有的1/5家庭的成员数量平均为3.1人,居中的1/5家庭为2.5人,而最贫穷的1/5家庭只有1.7人。^②

(4)单身者数量惊人。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

^① 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离婚时须提交单位证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离婚程序,推高了离婚率。

^② Cox W M, Alm R. You are what you spend. *New York Times*, 20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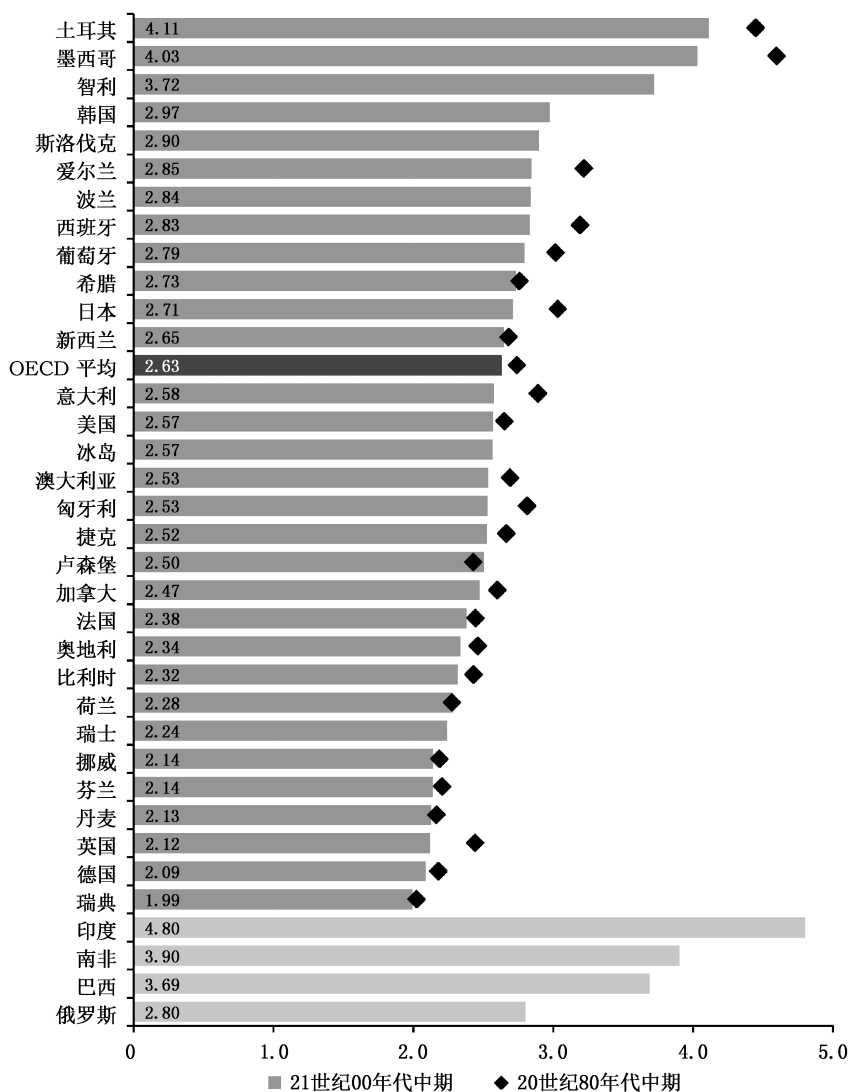


图 2.3 各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OECD, *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1.

会》一书中认为,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①截至 2010 年,超过 50% 的美国成年人处于单身状态,其中 3 100 万人独自一人生活(亦即每 7 个成年人中有 1 人选择独居),独居人口占美国户籍总数的 28%,独居家庭已经成为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的美国第二大家庭形式,远远超过核心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在性别上,1 700 万独居女性构成了独居人口的主体,

① (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沈开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独居男性也达到1 400万。在年龄上,18~34岁的年轻独居者有400万,35~64岁的中年独居者为1 500万,64岁以上的独居者约1 000万。在地理分布上,独居人口集中分布于美国各大城市之中,纽约为100万,而曼哈顿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选择独居,堪称全美单身社会的“首都”。在其他国家,日本、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独居者比例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瑞典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占家庭总数的47%),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达到惊人的60%。

单身者数量增长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主动单身。单身人士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同时又可以投身丰富的社交、社会生活。在(北欧)高福利制度下,原本属于家庭的责任为国家所承接,家庭所执行的职能越来越少,于是家庭存在的必要性就越来越小,这是我们所见证的单身社会崛起的重要原因。二是被动单身。被动单身与其说是独立,不如说是孤独。^①造成被动单身的重要原因是劳动收入低迷和社会福利匮乏,大量社会人口不敢走入婚姻并生儿育女。日本所谓的“无缘社会”可算是此类现象之一。^②

(5)离婚和婚姻外抚养子女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鸿沟,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如此,对孩子而言更是如此。逃离家庭主要以牺牲脆弱的孩子为代价。婚姻始终被视为私领域问题,但婚姻对子女成长和家庭贫困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女性而言,离婚往往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以2015年的统计为例,在OECD成员国中,大多数单亲家庭由母亲担任户主,由父亲担任户主的比例为9%~25%,其中,爱沙尼亚(9%)、哥斯达黎加(10%)、塞浦路斯(10%)、日本(10%)、爱尔兰(10%)和英国(12%)的比例最低,而挪威(22%)、西班牙(23%)、瑞典(24%)、罗马尼亚(25%)和美国(25%)的比例最高。^③2008年,美国单身母亲的贫困率高达37.2%。^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许多女性因照顾家庭而长期不工作或仅从事一些兼职工作,职场竞争力较弱,一旦离婚,很难拿到能够养家糊口的工资收入;其次,大多数离异的妇女要抚养小孩,但男方提供的子女抚养费通常是不充足的或是滞后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父亲不履行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再次,一些女性在丧偶或离婚后因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而无法全职上班,只能从事兼职工作,从而降低了家庭收入;最后,出于家庭分工的不同,在夫妻未离婚时,家庭往往给丈夫进行了教育投资和职业生涯的积累等,这些投资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共同完成的,但由于其收益是潜在的,因而无法在离婚时进行分割(例如,男性在退休时可以拿到

① 韩国年轻一代形容自己为“三抛世代”: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子。有些年轻人在“三抛”之上再加上“两抛”,即抛弃人际关系、抛弃买房。

②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无缘社会》,高培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③ OECD数据库(OECD Family Database, SF1. 1: Family size and household composition, OECD-Social Policy Division-Directorate of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June 12, 2016)。

④ Rejda G E. *Social Insura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较为丰厚的职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金是不会与其前妻共同分享的),女性往往是离婚财产分割的受损者。



专栏 2.3 两次人口生育率变迁

第一次人口生育率变迁(the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由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转变。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生育率的下降,人口总量基本保持平衡。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这一阶段。

第二次人口生育率变迁(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长期、稳定的婚姻模式不再流行,同居、离婚、分居和单身等现象趋于普遍。保持长久婚姻关系的家庭可能生育较多的孩子,离婚或独居的家庭则几乎没有小孩。相关数据显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初期,在 OECD 的 21 个成员国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平均增加 25%(在全部家庭中所占比率也增高至 17%)。在世纪之交,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瑞典和英国,以单亲父母为首的家庭占有孩子家庭总数的 1/4。双薪家庭也与日俱增,加上单亲家庭增加,导致现代家庭对儿童、年长者及其他需要照顾者提供亲身照顾的能力大为降低,而对政府提供儿童或老年人照料、经济补助及其他支持服务的需求大为增加。同时,在这一时期里,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预期寿命提高,因而人口总量(如不考虑移民因素)出现下降,平均年龄提高。

资料来源:①Lesthaeghe R.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 interpretation. In Mason K O, Jensen A.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5. ②(美)Neil Gilbert、(美)Paul Terrell:《社会福利政策引论》(第 8 版),沈黎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三节 关于家庭政策的几种观点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珍妮特·吉勒(Janet Giele)以美国社会为基础,对关于家庭政策的三种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①

^① Giele J. Decline of the family: Conservative, liberal, and feminist views. In Skolnick A, Skolnick J. *Family in Transition*. London: Longman, 2013.

一、保守主义的观点

保守主义认为,当代双亲家庭的崩解起因于离婚、婚外恋等问题增多,导致儿童在成长中会出现营养不良、学习成绩下降、行为缺乏管教以及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等诸多风险。解决办法在于重整家庭承诺、宗教信仰,以及删除对非婚母亲与女性单亲家庭的福利给付。近几十年来,导致家庭功能衰退的原因可能很多,如工业化、城市化、个人主义的兴起等。然而,保守主义者最担心的不是这些,而是传统道德的沦丧。

保守主义对家庭变迁的逻辑解释如图 2.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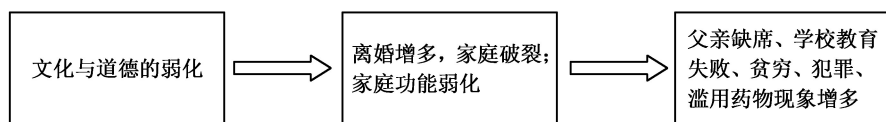


图 2.4 保守主义关于家庭变迁的解释

保守主义认为,家庭照顾是最自然、最好的照顾方式,机构化的照顾或任何足以替代父母的照顾方式都不应被鼓励,其甚至会影响子女的情绪发展和人际关系。保守主义还认为,福利国家的一些制度破坏了家庭,即政府介入托儿所、养老、济贫等事务,这些事务被认为是家庭应该做的事。一旦政府负起这些责任后,不但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且导致个人不再那么照顾家庭,家庭因此而瓦解;同时,家庭责任被国家承接以后,家庭的重要性降低,离婚、不婚者增多,破坏了传统家庭价值。^① 例如,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提出,政府慷慨的福利制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英国为单身母亲提供免费住房,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这么做,结果是英国的青少年怀孕率在欧洲居于高位,而意大利和西班牙排在末尾;英国在 1999 年增加了对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救济,结果是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大幅上升,据估计每年多生 4.5 万个婴儿。于是,免费住房和有所增加的福利救济使许多家庭在育儿方面略微宽裕了些,同时也鼓励了更多妇女在明知抚养条件不佳的情况下怀孕。

家庭主义在中国表现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强调,即对家人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在美国则表现为对所谓家庭价值(family values)的重申。我国当前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保守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已经很少决定子女的婚配对象,但仍然经常“逼婚”。

在实践中,许多国家从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旨在通过挽救婚姻、稳定家庭、减少未成年怀孕,达到维持传统家庭功能的目的。

^① 林万亿:《社会福利》,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0 年版。

二、自由主义的观点

自由主义者认为家庭的保障功能在衰退,儿童的健康、教育与贫穷等问题突出,但是它把矛头指向经济与结构变迁所产生的新需求没有被社会所满足。例如,女性全职就业以后,就不可能有时间照顾儿童;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家庭功能萎缩,家庭亲密合作关系也因就业形态而改变。然而,社会并未完全接手来支持家庭,因而就产生了不利于儿童的后遗症。

自由主义对家庭变迁的逻辑解释如图 2.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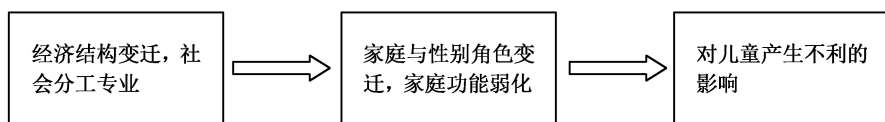


图 2.5 自由主义关于家庭变迁的解释

自由主义者将家庭的巨大变化归因于货币经济的入侵,而不是文化和道德上的衰落。自由主义认为,家庭变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个现代人都应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庭生活安排,包括“非传统”的家庭生活安排,如同居、单亲家庭、离婚、再婚等,甚至同性恋家庭。自由主义者不认为存在唯一最优形式的家庭形态。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拥护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建立社会安全网,以促进妇女的就业,减轻贫困的影响,并帮助妇女和儿童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三、女性主义的观点

女性主义主要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女性的传统父权家庭,认为家庭不只是一个小团体,而是由学校、教会、医院、职场共同构成的公民社会的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家庭与工作、家庭与社区、男性与女性的生活都应被重新调整。

女性主义对家庭变迁的逻辑解释如图 2.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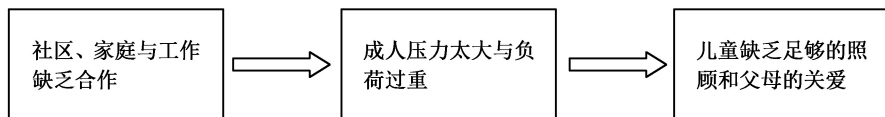


图 2.6 女性主义关于家庭变迁的解释

女性主义者不同于保守主义者,他们接受家庭的多样性,以应对现代经济的需求;女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他们接受家庭固有的特殊性和情感性质,认识到亲密

的养育关系(例如养育子女)不能全部依赖于提供正式照料的社会安全网。

在劳动力没有商品化之前,家庭自给自足,丈夫和妻子都既从事生产性劳动,也从事家务劳动,两种劳动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在劳动力被商品化以后,生产性劳动成为有酬劳动,家务劳动仍然是无酬劳动。生产性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界限变得非常分明。实际上这两种性质的劳动并非单纯的并列关系,而是互为前提的。在资本制下,家务劳动不能离开生产性劳动而单独存在;而如果没有家务劳动,生产性劳动也不可能成立,仅依靠工资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生活所需。事实上,没有家务劳动的介入,劳动力人口根本就不可能再生产。

父权制是调整生产性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首先,它将生产性劳动凌驾于家务劳动之上;其次,它根据性别将人们固定分配到两种劳动中去。因此,女性主义者批评,资本制与父权制结合所形成的福利制度助长了性别差异化,福利制度是以丈夫从事生产性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标准家庭”为前提而设计的,因而对单身母亲、独居女性等非标准家庭没有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①

女性主义认为,在传统家庭中,男性压迫女性,离婚和单亲家庭本身并无弊端,离婚或分居往往是女性勇于脱离被迫害的父权家庭的象征,离婚率的升高也反映出处于不幸福婚姻状态的女性人口数量的减少。女性主义并不反对家庭制度,只是反对传统上由两个成年男女组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唯一家庭形式,提出家庭政策应该用来作为解放女性的手段,例如,设置带薪水且两性共享的生育假与育婴假等。

女性主义认为,就社会效率而言,政府花费大量教育资源,让教育机会愈趋平等,却因家庭因素导致一部分具有创造力与劳动力的女性被迫居家照顾老幼、残疾的家庭成员,这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专栏 2.4 英国“二孩福利封顶”政策面临巨大挑战

在 2015 年财政预算中,英国政府提出了“二孩福利封顶”(two child limit)政策,宣布冻结一个家庭中第三个及以后的孩子在以前可以享受的若干项补贴,主要包括统一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s)、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以及抚养人收入补贴(income support with dependants allowance)。2015 年 10 月,英国政府就业与养老金部前秘书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表示,此项改革将让家长明白,“养孩子需要花钱”,纳税人不能为更多的孩子买单是理所应当,从而使这些家庭仔细考虑是否会生两个以上的孩子。

^① (日)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李莲花、李永晶、朱珉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二孩福利封顶”政策规定:自2017年4月6日起,家庭里的第三个及以后的孩子(这自然包括第四个、第五个或者更多),除非符合“特殊条件”,否则将不能再得到额外的补贴。不论你生了多少孩子,最多只能领到两个孩子的福利金。

根据规定,“二孩福利封顶”有一些例外情况:多胞胎,孩子是从地方当局领养而来,或者孩子是母亲在非自愿情况下(例如被强暴)出生的。然而,例外的案例仅占4%。

2019年8月,英国政府就业与养老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60万儿童受到“二孩福利封顶”政策的消极影响,在受影响的16万多个家庭中,59%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工作。几乎所有受影响的家庭需要削减食物、药品、供暖和衣物的支出。很多家长表示,这给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带来了压力。

反对者认为这项政策致使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恶化,试图游说政府撤销这一项封顶政策。许多人认为,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这项政策意味着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能得到更多,仅仅是因为出生的顺序不同。2019年7月31日,《卫报》报道,109位社会政策学者联合表示,该政策“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大损害”,导致“英国最贫困的儿童生活水平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

第四节 社会保障给付单位的选择

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是在资本制(劳动力商品化)和父权制(男性养老模式)的框架中成立的。^①

首先,在资本制下,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换得工资和福利。在劳动力市场,“家庭工资”的思维方式占据主流,工资被设定在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水平上。对有配偶的职工,雇主还要支付抚养津贴。在税制方面,不仅对子女而且对配偶也设有抚养扣除,课税也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劳动者获得的回报超出了单纯保全劳动力生存权的水平,换句话说讲,就是在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同时,劳动者还具有一定的公民权(即劳动力不纯粹是商品,还具有一定的“去商品化”色彩)。

其次,社会保障的缴费和给付在原则上均以家庭为单位,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性养老模式使得女性难以独立。工薪阶层的养老保险向遗属支付遗属年金,医疗保险也支

^① (日)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李莲花、李永晶、朱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付家属的医疗费。在日本、美国,养老保险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在德国,医疗保险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

一、以家庭为社会保障给付单位所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社会保障给付单位的制度框架遭遇新的挑战。

(1)个体从家庭中脱离出来,就意味着与社会保障制度脱离。例如,对于女性而言,离婚不仅伴随着陷入贫困的危险,还意味着丧失领取养老金和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

(2)个体从家庭中脱离出来,往往在社会保障权利上受到歧视。例如,以家庭为单位的制度一般都倾向照顾家庭主妇,随着女性就业的增加,该制度就有失公平。又如,家庭养老金意味着缴费者必须缴纳足够多的养老保险费,才能支撑夫妇的养老金水平,但这种方式意味着单身者(甚至是未婚妈妈)要供养已婚夫妇。^①

(3)个体化越来越普遍,客观上要求政府的福利政策去性别差异化。政府应该以性别中立为原则,将社会保障从以往的以家庭为单位改为以个人为单位。

(4)家庭形态的多样性给社会政策制造了特别的难题——提供的服务对某一形态的家庭是合适的,但对其他的家庭可能反而不利。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对某些形态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可能会改变和干涉人们的婚姻、生育行为。例如,2020年3月,日本安倍政府宣布给全日本每个家庭邮寄两只口罩,结果引发了大量的指责,因为家庭人口数量差异很大。

二、我国社会保障给付单位的争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另有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总趋势是1~3人户的比重持续上升,4人及以上的家庭比重持续下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支持个人而非家庭是我国家庭政策的最大缺陷之一。因此,在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时,以家庭为单位成为研究者最基本的主张。^②例如,有人认为要纠正单纯以个人为单位提供福利保障的弊端,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制度设计,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支持家庭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或是认为只有强调家庭作为福利对象的整体性,才能真正支持和强化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功能与责任,激活家庭的潜力,并延续重视家庭的优秀传统。

^① Hinrichs K, Jessoula M.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Pension Reforms: Flexible Today, Secure Tomorrow?*. Berlin: Springer, 2012.

^②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2020年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411号(社会管理类293号)提案。

至于如何在政策内容、视角中体现以家庭为单位,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措施,将有养老或育儿需求的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在内,保障家庭的经济安全,体现对家庭责任承担的社会承认。第二,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允许保险在家庭成员(配偶、法定受抚养者)之间转移、延伸,以满足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家庭成员的需求。第三,针对女性产后再就业难、职业发展受影响、生育和养育成本高等,进一步完善父母产假制度,大力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工作。



专栏 2.5 我国个人所得税中的家庭政策

我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七项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可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予以税前列支,免征个人所得税,有利于根据纳税人的家庭情况有针对性地减少纳税人负担。我们在此介绍 2025 年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1.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每个子女 2 000 元/月。

(1)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2 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2)学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工教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

(3)年满 3 岁至小学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女,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2 000 元的标准执行。

(4)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照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2.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独生子女 3 000 元/月;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 3 000 元/月,每人不超过 1 500 元/月。

(1)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照以上标准定额扣除。

(2)纳税人非独生子女的,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须签订书面分摊协议,指定分摊优于约定分摊。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3)以上所称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含)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含)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3. 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毋庸置疑,把家庭作为社会保障给付单位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家庭视角仅仅是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而已,并非唯一视角,而且家庭视角也并不是万能良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漏洞,并非都能产生正面的、积极的政策效用。其可能的负面作用如下^①:

(1)以家庭为单位可能引发道德风险。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设计,有时反而会破坏家庭,或是有违社会公平。例如,假离婚可以获取更多的低保补助金和政府拆迁款;又如,一些炒房者为了获得购房资格或享受贷款优惠利率,使用“假离婚”的方式来钻政策漏洞。

(2)家庭整体利益和家庭中个体成员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生育和抚育行为符合家庭、儿童的利益,但妇女往往因此而遭受“生育惩罚”——工资损失、断裂的职业生涯、渺茫的晋升机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如前所述,女性主义认为,通过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照料家庭的分工模式,男性不仅从家庭内部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中获利,而且从妨碍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参加公平竞争中获利。母亲的利益也经常被放在家庭利益、儿童利益的对立面,在公共辩论中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母亲外出工作会破坏家庭的稳定性、伤害她们的孩子,母亲们把自己的生活、愿望和需求摆在家庭、孩子之前,是自私自利的、冷漠的。

(3)社会变迁导致家庭形式变化,如何确定“家庭”变得越发困难,更不用说以家庭为单位来制定和实施政策了。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人口为2.61人,说明三四口之家已经不再是主流,离异家庭、丁克家庭、晚育家庭、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的数量在增多。家庭居住存在大量的人户分离、多家庭共同居住等情况,给家庭的认定和社会保障待遇的发放以及相应的公平性带来诸多挑战。例如,有研究者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展示了中国社会有关“家庭”概念理解和操作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对公平性的挑战。

(4)在家庭结构和家庭形式日益呈现多样性的情况下,家庭本位的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越来越不确定。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证明,家庭的不稳定和多元化削弱了家庭的福利传送能力,许多人无法借由家庭获得福利国家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开始调整自己的福利供给和保障方式,把以家庭为单位设计的福利供给和保障制度引入以

① 张亮:《反思家庭政策研究中的“家庭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9日。

个人为单位设计的轨道,即所谓社会福利传送路径“去家庭化”,以实现社会福利对公民更有效的覆盖。因此,尽管西方福利国家日益重视把家庭纳入社会政策的视野之中,但不是单单通过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政策,而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个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负担来实现的。国内有研究者也指出,在“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到来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既是个体应对现代性的策略方式,也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依据和价值取向。这种个体价值观层面的家庭变革及动态,以及这种变革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今后需要深入探究的。



专栏 2.6 回力镖世代 (boomerang generation)

在欧美社会,孩子成年后一般会离开家庭,独立自主生活。然而,近年来,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日本和欧美社会出现“回力镖世代”——部分年轻人在离开父母家庭后,因无力负担高昂房价或租金,被迫“回巢”与父母同住。有父母坦言,子女回巢令他们的开支大增,他们有时被迫放弃旅游等生活享受。部分欧美父母为减少子女的依赖性,会向子女收取租赁费,或者要求其承担水电费等账单费用。



拓展阅读

世博大礼包发放中关于“家庭”认定的困惑

有关房贷政策、裸官界定、家庭养老等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已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取向,尤其是世博大礼包更是明文指出以“户”为单位。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重要性,但是有关“家庭政策”的定义往往比较含糊。

在世博会正式运行期间,上海市政府为了表示“对上海市民奉献的一种心意”以及“对上海人民支持世博的感谢”,对所有上海常住居民,包括在上海有居住证的外来人口,每户免费赠送一份世博大礼包——用一个印有中国馆的大信封装了一封感谢信、一张世博门票、一张纪念交通卡、一张世博周边公交时刻表、一枚海宝徽章和一份上海交通地图。

在发放世博大礼包的过程中,针对上海户籍人口的发放过程非常简单,工作人员按照一本户口本一个世博大礼包进行发放,在居民户口簿户主栏上加盖海宝纪念章印戳,并让领取人在《上海市居民家庭赠票赠卡发放登记表》上签字即可。但由于一本户口本并不是一个家庭,也不是所有的上海家庭都拥有户口本,所以各种矛盾还是非常突出的。

首先,完整的小家庭没有家庭户口本而导致矛盾。例如,一对上海年轻夫妇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并未将户口从各自的父母家迁出,他们买了自己的房子,生了一个孩子,考虑到孩子以

后的就学问题,他们把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家。

其次,一本户口本上有几个家庭而导致矛盾。由于分户并不是强制性的,并且部分上海居民因住房紧张,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只有一本户口本,因而在领取大礼包的时候只能领一份,导致分配不均。

再次,离婚后未分户而导致矛盾。离婚后虽然可以分户,但根据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离婚后必须有独立的住处才能分户。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离婚者都能买得起房,导致有人在离婚后依然住在一起,有人离婚后重新租房住,而租住的房子是很难落户口的。

最后,集体户口人群被排除在发放礼包的对象之外而导致矛盾。

资料来源:沈奕斐,《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复习思考题

1. 我国民政部2016年《关于“关于建立离婚疏导机制的提案”答复的函》指出:“我们也注意到了闪婚闪离、冲动离婚现象逐渐增多以及由此带来的婚姻家庭问题,并在坚持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基础上,指导地方民政部门积极开展婚姻家庭文化宣传、结婚登记颁证和婚姻家庭辅导工作。通过开展婚姻家庭文化宣传工作和举办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增强当事人的婚姻家庭责任感和法律意识;通过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为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情感辅导、心理疏导、危机处理、离婚后辅导等多方面服务,帮助当事人慎重对待婚姻关系、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增强当事人婚姻家庭责任感,提升其应对婚姻家庭问题的能力。”针对冲动离婚,不少地方的民政部门与司法部门都尝试了干预措施,如婚姻登记机构实行离婚预约制度,给欲离婚的夫妻设置“缓冲期”。自202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备受关注的“离婚冷静期”也正式生效。该法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有人认为,适度的离婚干预有助于婚姻的和谐与稳定,有积极意义。你如何理解和评价民政部的上述表述以及民政部门关于离婚干预的举措?

2. 2012年我国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将产假由原来的90天调整为98天,并规定女职工如果难产(包括剖宫产),则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产假期间依法享受生育津贴。除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女职工产假外,目前大多数地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授权下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女职工还享受30~90天的奖励假,丈夫享有7~30天的护理假(男

性陪产假),并明确工资待遇照发。目前我国劳动者每年除享有115天休息日、节假日外,还可以根据工作年限,享受5~15天的带薪休假,生育女职工可以将带薪年假等假期与产假合并使用。有人认为,目前女性的产假不宜继续扩大,否则会增加用人单位的人工成本,增大女性的求职难度,降低女性的就业竞争力。你认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如何平衡生育政策与就业政策?

3. 生活中很多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有医保账户,也有可能某个成员的医保账户余额不够用,而另一成员的账户余额比较充足,闲置在那里造成浪费,于是希望能将自己账户内的资金给身边有需要的亲人使用。2019年2月,四川省医疗保障局下发《四川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有关政策的通知》。从2019年3月1日起,四川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使用人群由原来的职工本人扩大到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夫妻双方父母和子女。除四川之外,目前浙江、广西、黑龙江、哈尔滨、福建厦门、江苏常熟、福建漳州等省市也已在推行个人医保账户家庭共用的政策。不过,目前各地已施行的医保共济政策适用范围仅限于城镇职工医保账户,不包括城镇居民医保账户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账户。请结合本章所介绍的家庭政策相关知识,分析这一政策的必要性。

4. 长期以来,我国的家族内部具有较强的信任感,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改革开放后,处于劳动年龄的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姊妹)、叔伯舅、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亲属在创业以后,会在家族内分享创业经验并培训家族后辈,由此形成家族型的“连锁企业”。有时这些创业经验分享会扩大至全村居民。这一家族(同村)内部在资金、企业管理、销售网络以及产业链等方面的互相帮助,减少了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加快了企业的成长。例如,著名的申通快递、圆通快递、中通快递和韵达快递等基本上发源于同一家人。但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以及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有些人担心这种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并对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新的挑战。试分析并评论之。

5. 美国民主党的2020年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家庭价值观”。他举例阐述道:①如果一位母亲不能和新生儿一起度过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周和头几月,因为雇主不提供带薪产假,另外她不得不上班养家,这就违背了家庭价值观。②如果丈夫不能从工作中抽身照顾患癌的妻子或病重的孩子,这就违背了家庭价值观。③如果一位母亲被迫将生病的孩子送到学校,因为雇主没有提供病假,而且她留在家里就没有收入,这就违背了家庭价值观。④如果丈夫、妻子、孩子整整一年时间都无法一起度过一个假期,这就违背了家庭价值观。试分析桑德斯的这些观点属于家庭政策的哪个流派。